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1期（民國97年9月），1-5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
——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

巫仁恕**

摘　要

明清江南園林文化的興盛，並不能孤立於社會經濟的脈絡之外，而單純地被視為士紳階層與文人文化的產物。本文的前半部份，將園林重新放回明清的社會，發現明清盛行的築園風氣，在當時人的觀感裡，並不完全是正面的形象。而透過對蘇州一地園林文本的分析，則可看到士大夫和文人在社會觀感與壓力之下，如何自陳其築園的合理性；進而藉由文本的書寫，來建構他們理想的園林文化。此外，明清江南著名的園林有許多是位在城市或城郊關廂附近，這些園林和城市的經濟發展、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說是關係密切。本文的後半部份即從城市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園林的位置和蘇州城市發展在空間上的關聯性。結果顯示蘇州園林的位置在空間上的分布，與城市各個區位的機能發展息息相關。而私家園林的開放，不但逐漸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同時也形成市民對公共休閒空間需求的新觀念。於是有私家園林被廟宇與社會團體併購，而逐漸轉向成為公共化的休閒空間。

關鍵詞：園林、明清、江南、蘇州、城市

*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子計畫之研究成果，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學術討論會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進入中國城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2月）中宣讀，惠承評論人賴惠敏與林麗月二位先生，以及多位同仁及與會學者多方指正，獲益良深，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年3月2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6月26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導 言

中國現存的園林古蹟中，明清江南的私家園林為數最眾，於是成了中國古典園林的重要代表。而至今尚存又為人所熟悉的明清江南園林，大多是位在蘇、杭等大城市中。尤其是在蘇州一地，自從 1990 年代末，拙政園、留園、網師園、環秀山莊和滄浪亭、獅子林、藝圃、耦園、退思園等相繼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後，蘇州園林更是聲名大噪。

因為現有的明清江南園林都集中在大城市，所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園林的研究。早期關於中國園林的著作，大多是屬通論性的介紹，而且焦點放在園林建築與園藝的美學，以說明傳統中國人重視自然的觀點。[1]之後陸續有從哲學、文學、風水學等角度來研究園林者，而造園名家與造園理論等課題也都受到高度的重視。[2]近年來學界有以文化史與文學象徵的角度來看明清園林，將園林詮釋為明清士大夫著意隱居以及建構生活品味的空間；或從文本的分析出發，論及園林書寫的塑造與隱喻。[3]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強調園林所具有的社會功能與政治作用，包含了人際網絡與社會聲望的建構等等。[4]明清園林對歐洲文化的影響，也被學者重新研究而賦予了新意。[5]這些研究呈

---

1 早期最重要的兩位園林研究者——童寯與劉敦楨，都是建築學者，前者著有《江南園林志》（1937 年已完成，至 1963 年由北京之中國工業出版社出版），後者撰有《蘇州古典園林》（1963 年完成，至 1979 年由北京之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兩書已成園林建築研究的經典。又最新的江南園林史專著，參見魏嘉瓚，《蘇州古典園林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2 有關這類研究的回顧，可以參考田中淡著，黃蘭翔譯，〈中國園林史研究的現況與問題點〉，《空間》，期 65（1994 年 12 月），頁 57-64。

3 關於園林建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參見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6）。該書除了論及園林本身以外，還透過對《寓山志》的解讀，分析園林的文本塑造與其隱喻。

4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February 1992), pp. 55-81. 本文以祁彪佳築寓園為例，從建構社會關係(social connections)的角度，來探討晚明士大夫築園林的目的。

5 Bianca Maria Rinaldi,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unchen: Meidenbauer, 2006). 本書探索明清耶穌會士將中國的園林與園藝知識傳播到歐洲的過程。

現園林的多個面向，無疑地豐富了我們對園林的了解。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明清江南園林文化的興盛，並不能孤立於社會經濟的脈絡之外，而單純地被視爲士紳階層與文人文化的產物。著名的藝術史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就對以美學角度來觀察園林文化不以爲然，而主張應將園林置於晚明以來商品經濟的脈絡來分析。[6]本文的前半部份，將園林重新放回明清的社會，發現明清盛行的築園風氣，在當時人的觀感裡，並不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再透過對蘇州一地記錄園林文本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士大夫和文人在社會觀感與壓力之下，如何自陳其築園的合理性；進而藉由文本的書寫，來建構他們理想的園林文化。

其次，明清江南著名的園林有許多是位在城市或城郊關廂附近，這些園林和城市的經濟發展、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文的後半部份擬從城市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園林的位置和蘇州城市發展在空間上的關聯性；並且探討城市園林的開放，又是如何影響蘇州一般市民的生活。

一、明清江南城市的築園風潮

明初至中葉仍屬於經濟恢復時期，江南雖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不過當時無論是官宦士大夫或富人，一般在消費方面是頗爲簡樸的。明中葉以前，住宅居室的建築無論在裝飾與空間方面都很樸素，不致於過度華麗。即使是富人家也都是「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所以「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7]明初雖也有富人建園林，惟規模雖宏，卻不奢華。最著名的例子是蘇州府周莊鎮關於沈萬三家宅的「傳說」，明清不少史籍都記載沈氏家族雖富有，但所有的園

6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作者又強調明園林幾經修建，已非原來的形式(form)。但也有學者強調明清園林的修復過程中，仍會重視保留原有的空間佈局與整體配置。見許亦農，〈作爲文化記憶的蘇州園林（11~19 世紀）〉，收入米歇爾・柯南、陳望衡主編，《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 323-354。

7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5，〈化俗未易〉，頁 170。

亭住宅亦不過是「中人家制耳」。[8]另外，蘇州在明代前中期士大夫所建的園林還有二例，一是禮部尚書吳寬(1435-1504)之父，吳融(號孟融)所治之「東莊」。園中有稻畦、果林、菜圃等，吳氏世居該園，「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9]另一個是明朝御史王獻臣（弘治 6 年[1493]進士）所蓋的拙政園，該園約建於正德 5 至 9 年(1509-1513)之間。園中種植許多具有經濟價值的農藝作物，園主也自稱要效法古人「築室種樹，灌園鬻菜」。[10]由此二例可見當時的園林規模不小，且是以耕讀的生產活動爲主，並無奢侈富麗之態。[11]

爲何在明前期富人不敢興建奢華的園林呢？除了因爲消費力有限之外，從文獻來看，還有可能是與賦役制度有關。據乾隆《震澤縣志》描寫明代的情形：

> 邑在明初，風俗誠樸，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為居，裙布荊釵而已；即中產之家，前房必土墻茅蓋，後房始用磚瓦，恐官府見之以為殷富也。[12]

可見當時即使是中產之家稍有資財者，都深怕被官府發現後，會被僉選爲糧長役之類的苦差事，所以並不敢過於聲張。

---

8 明人楊循吉(1458-1546)《蘇談》載：「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不甚宏大，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陶煦(1821-1891)所撰的光緒《周莊鎮志》記載沈萬三家宅時亦云：「倉庫園亭住宅互相聯絡，其巨富氣象猶可想見，然亦僅中人家制耳」；「可知萬三里居，並無奢侈之蹟，故明太祖雖忌之，而無可加誅也。」參見〔明〕楊循吉，《蘇談》，〈萬三遺宅〉，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上冊，頁 170；光緒《周莊鎮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 8 年元和陶氏儀一堂刻本，199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17，卷 2，頁 23a。其實，沈萬三在元朝時早已過世，沈氏在明初洪武年間又分爲四家，但是人們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時，仍是習慣用沈萬三來概括之。上述的記載應該反映的是明初沈萬三家族的情況。又據學者考證，沈家一敗塗地，是從洪武 26 年「藍玉案」開始的。參見顧誠，〈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蹟考〉，《歷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65-84。

9 〔明〕李東陽，〈東莊記〉，收入邵忠、李瑾選編，《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4），頁 107。

10 〔明〕文徵明，〈王氏拙政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90-91。

11 據柯律格的研究發現，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蘇州園林，主要是生產性質的園林；到十六世紀後半葉，園林才轉變成奢侈消費的物件。參見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之第一章。

12 〔清〕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 11 年修光緒 19 年重刊本影印，1970），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20，卷 25，〈風俗序〉，頁 2a。

明中葉以後，江南的住宅逐漸走向奢華，《名山藏》記嘉靖年間(1522-1566)之前與其後的變化：「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翬碧相，不可名狀矣。」[13]可見嘉靖中葉以後，約當十六世紀中期以後的江南城市，逐漸吹起一股建築豪宅與園林的風氣。在這波風氣中江南的縉紳士大夫是帶動者，《說夢》云：「吳中士大夫，咸成而朊，輒構園而居。」[14]而且愈華麗愈顯示自己的成就非凡，就像《五雜俎》所云：「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15]這種風氣也吹到百姓與富人之家，若不是裝飾華麗，就是擴大居第的空間。在方志中就常提到：「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分者嘆其不能頓革」；「富家堂寢外間有樓閣別館」；江南富翁，「輒大爲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爲常耳。」[16]顧起元(1565-1628)說得更明白：

>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17]

由此可見就連老百姓也受此風所染，即使沒有擴建住宅空間，也會重金打造自家的客廳與裝飾，甚至妓院「勾闌」也是雕樑畫棟。

明代中葉以後的江南住宅，之所以逐漸走向奢華，一方面是因爲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大量的財富累積，使得消費力提升，也就是「消費社會」(consumer

13 〔明〕何喬遠，《名山藏》（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崇禎 13 年刊本影印，1971），卷 102，〈貨殖記〉，頁 11b。

14 〔清〕曹家駒，《說夢》（台北：新興書局，1974），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4 冊 8，卷 2，〈紀松江園亭之興衰〉，頁 15b。

15 〔明〕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 3，〈地部一〉，頁 75。

16 〔清〕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卷 25，〈風俗序〉，頁 2a；〔明〕董邦政修，黃紹文纂，嘉靖《六合縣志》（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7，卷 2，〈風俗〉，頁 4a；〔明〕唐錦，《龍江夢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 17 年郭經刻本影印，199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22，卷 4，頁 13a。

17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 5，〈化俗未易〉，頁 170。

society)的形成。[18]另一方面是明初制約這種奢侈消費的賦役制度出現變化，因爲士紳可以優免徭役，或透過其他手段逃避糧長役，於是不用再顧慮被僉選爲糧長役，而大大方方地蓋起園林。至於有錢的富豪巨賈，也可以透過捐納買得功名地位，一樣可以享受士紳的待遇。此外，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江南建築技術的提升所帶來的影響。若要能夠擴建住宅與廳堂，向高聳發展，必須在建築技術上有所改進。在這方面江南地區，尤其是蘇州，具有優越的技術條件。蘇州向來以建築工匠聞名，如吳縣有「香山幫」，即是著名的大木作業匠。而且磚的大量使用，也加速了傳統木結構建築的改造。蘇州是民居中最早建造磚墻的地區之一，磚墻的出現減輕了柱子的承重，並且使屋頂出檐減少，使扶墻柱加密，而柱身變得更細長，廳堂也變得更高大和寬敞、明亮。[19]以上這些都是爲什麼明中葉以後，奢華的住宅居第逐漸能在江南普及與盛行的原因。

縉紳士大夫在居室建築方面最奢華之舉，莫過於營建園林了。《萬曆野獲編》云：「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20]所謂的居第或第宅，指的是貴顯者的住宅，而園林是以種植花木、建亭台高樓，以供遊賞的住宅。在當時士大夫的眼中，建園林比建居第更具意義，就像明代湖州人陳函煇(1590-1646)，在〈遊靈水園記〉一文中所云：「湖中諸大家，類治居第，而寡園林之趣，鮮有可觀者。」[21]嘉靖朝聞名一時的大文豪王世貞(1526-1590)可作爲士大夫愛園成癖的代表。[22]他喜歡遊覽林泉園圃，並爲之作記。在〈太倉諸園小記〉一文中，他聲稱：

> 今世貴富之家往往藏鏹至巨萬而匿其名，不肯問居第。有取第者，不

---

18 從消費的角度來看明清的奢侈風氣，反映了消費社會的誕生。而消費社會所以在晚明誕生，導因於明中葉以後在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和十八世紀英國的情形頗爲相似。有關晚明消費社會的興起，參見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第一章。

19 參見張朋川，〈明清書畫「中堂」樣式的緣起〉，《文物》，2006 年第 3 期，頁 88-90。

2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6，〈玩具・好事家〉，頁 654。

21 〔民國〕《烏青鎮志》（上海：上海書店據民國 25 年刻藍印本影印，1992），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23，卷 17，〈園林〉，頁 11a。

22 他自號「弇州山人」，所以他在太倉城裡所建的園墅題名爲「弇山園」。

復能問園。而間有一問園者，亦多以潤屋之久溢而及之。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為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人。[23]

王世貞認爲有錢人應該要蓋居第、築園林，而且應該以築園爲優先。因爲居第「足以適吾體」，「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然而園林不但可以「適吾耳目」，而且其便及於外人也。看來經過精心設計的園林，對士大夫更具有文化象徵的意義與社會功能，所以他們會認爲園林較居第更有趣，更值得觀。王世貞以自己能懂得築園爲傲，自認是當地引領築園風潮之先驅。明末像王世貞這樣有築園之「癖」的士大夫還不少，像是名宦祁承㸁(1565-1628)與其子祁彪佳(1602-1645)，或是明季殉節的名臣如倪元璐(1593-1644)之輩，也都有築園之癖。[24]

江南大城市內及近郊的園林，在明清之際曾因戰亂而頹敗。例如常州武進縣城之東北隅，有園初名「東皋」，在明代曾是「曹尙書」故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但是，明清之際江南城市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使得這些園林遭到極大的破壞，所謂「乙酉軍興時，籍之爲兵使者署，園寖以圮。」[25]清人葉夢珠(1624-?)在《閱世編》也記載了不少松江府內的園林，在明清之際遭受兵災影響而傾廢的例子。聊舉一二例爲證，北城安仁里的樂壽堂，原是明朝布政使潘允端(1526-1601)所建之遊宴地，環山臨水，嘉樹扶疏，園林之勝，冠絕一時；但崇禎之季，園亭殘毀，旋遭鼎革，乃供佛像於中堂，延僧住持。又松江府城北郊之東北二、三里有桃園，園種桃柳名花，有累石疊

23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明人文集叢刊》，冊 22，〈太倉諸園小記〉，頁 8a。

24 祁承㸁自陳其「素抱園林之癖」，又說：「大抵素心人，不能一日無園居，猶王佛大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非虛言也。」倪元璐雖是甲申死節名臣，但據云其「愛構園亭，頗極工巧」。參見〔明〕祁承㸁，〈書許中秘梅花墅記後記〉，收入衣學領主編，王稼句編注，《蘇州園林歷代文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98；〔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倪文正公〉，頁 169。

25 〔清〕邵長蘅，《青門簏稿》（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1997），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247-248 之《邵子湘全集》，卷 9，〈東皋園記〉，頁 3b-4b。

山、堂榭亭台之美，吸引不少遊人，在崇禎 16、17 年(1643-1644)之間，已成爲一邑名勝；之後卻遭逢明清鼎革，園主逝世，而該地又爲吳淞往來孔道，營兵遂隨意而入，攀花摘果，園丁不敢問，園遂日廢。[26]即使如此，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化，似乎並沒有阻礙築園的風潮，直到清初仍是如此。清人王芑孫(1775-1817)爲蘇州怡老園所寫的〈圖記〉中就指出：「順治、康熙間，士大夫猶承故明遺習，崇治居室。」[27]由此可見，築園之風歷經明清易代，仍然一直延續到清代。

築園之風所以歷經明清二代不衰，究其原因，就像《五雜俎》所云，園林是致仕縉紳「以明得志」之作，也就是爲了顯示自己的財力與成就；然而一旦相習成風之後，便成爲彼此爭勝的景象。而且無論是顯示成就或是炫耀競賽，城市都提供了最佳的展示空間，所以無論是縉紳或富豪，都優先考量在城市築園林。如何良俊(1506-1576?)就形容：「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28]清人葉夢珠提到松江府的情形亦如是：「余幼猶見郡邑之盛，甲第入雲，明園錯綜，交衢比屋，闤闠列廛，求尺寸之曠地而不可得。縉紳之家，交知密戚，往往爭一椽一磚之界，破面質成，寧揮千金而不恤。」[29]

不只是縉紳彼此以築園林爭勝，縉紳還面臨有錢的富豪，尤其是富商的競爭。從以下幾個例子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如明人費元祿居江西鉛山縣河口鎮，據他說始遷居鉛山時當地僅有二三戶人家，七十餘年後，而百而千，成爲該縣巨鎮。又說：「閭閻之人，與縉紳先生競勝，而園林亭榭秀甲一時，每花時春事，元夕燈棚，歌聲伎館，鐘鼓絲竹，千家嘹喨，士女雲集，鬪雞蹴踘，白打樗蒲，賞心樂事，技藝雜遝，蓋其舟車四出，貨鏹所興，鉛山之重鎮也。」

---

26 〔清〕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 10，〈居第一〉，頁 215、218。

27 〔清〕王芑孫，〈怡老園圖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67。

28 〔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明嘉靖 44 年何氏香嚴精舍刊本影印，1971），卷 12，〈西園雅會集序〉，頁 9a。

29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 10，〈居第一〉，頁 208。

可見當地經商致富的商人，也學著築「園林亭榭」，來「與縉紳先生競勝」。[30] 清代在河道總督行署的所在地——淮安府清江浦，[31]則是看到官員與鹽商以園林爭奇鬥勝的情形。據《水窗春囈》記載，清江浦雖爲繁華之地，但園林之勝極少，至清中葉則發生了變化：「若近年淮北鹽務大旺，商於此者張、陳諸大家及路觀察各爭奇鬥勝，頗有林泉之趣。」[32]在明清江南的大城市中，很容易發現商人所建的園林，如清代蘇州閶門東有粵商在市廛中建園林，名之爲「勺湖」。[33]尤其是清代揚州鹽商所建的園林更是耳熟能詳，據《水窗春囈》指出，揚州園林之勝導因於鹽商的豪奢，以及爲了討好南巡的乾隆皇帝，所以許多園林是仿造宮廷園林的形式。[34]

要興築園林需要多少經費呢？雖然在明清的筆記中有一些概略性的敘述，如「數千金」或「數萬金」，然而這些數字或有誇大，所以真實性頗令人生疑。在清人所撰的〈園林記〉中，有少數會記載所花的費用，以下就舉蘇州園林數例說明之。如汪琬(1624-1691)所建，在蘇州城郊橫山山麓的堯峰山莊，其自云：

> 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筠更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以個計，瓦甓磚釘以枚計，炭砂以斛計，漆油以斤計者，共一萬一千五百有奇。閱四旬，縻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群游於此。[35]

在園主自撰的〈園林記〉說明購買舊屋花了白銀 45 兩，可是翻修改建所耗的

---

30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1965），收入《叢書集成簡編》，冊 222，〈卷上〉，頁 1。

31 據〔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4，〈河道總督駐節之所〉云：「國初，河道總督行署，駐山東濟甯州。康熙十六年，聖祖以江南功程重大，特令移駐淮安清江浦。雍正三年，添設北河總督，駐濟甯；而改南河總督，仍駐清江。」頁 80。

32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下，〈清江浦〉，頁 71。

33 〔清〕沈德潛，〈勺湖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22。

34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下，〈維揚勝地〉，頁 72；關於揚州鹽商的園林及其對揚州城市文化的影響，參見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8-210.

35 〔清〕汪琬，〈堯峰山莊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23。

材料與工錢驚人，而費用幾乎與購買的費用相當，也就是說總共的花費接近百兩。又蘇州城郊近虎邱處有朱氏園，約成於康熙年間，戴名世(1653-1713)曾記園主買田圃改建爲園林，「園之大二百畝，凡費金錢數萬」；其間竹木水石與亭榭樓閣，可說是極一時之盛。[36]第三個例子是蘇州城郊的靈巖山館，係畢沅(1730-1797)於乾隆 48、49 年間(1783-1784)所購築，梁章鉅(1775-1849)在《浪跡叢談續談》中提到，該園園主買地與建園的工費共計白銀十萬兩左右，又歷經四、五年才算完工。[37]這算是耗費較昂，而且費時較久的園林。十萬兩看似誇大，但其他地方的私家園林，亦曾有類似花費數十萬之譜的例子。[38]第四個例子是清蘇州府昆山縣畫家顧春福，他在洞庭東山附近構建隱梅庵，歷時四年，於道光 26 年(1846)完成；「計地十畝，屋四十楹，咸茅檐，樹梅三百本，共靡錢三千緡焉。」[39]其所謂三千緡，即三百萬文銅錢，換算爲白銀約二千兩。[40]

而以上這四個例子還都是在城郊，而不是城內的園林，營建費用從數百兩、數千兩，到十萬餘兩，可能都還不算是最奢華的。在城內建園林的花費，勢必更高。不過因爲筆者所見史料有限，僅見二例。其一是嘉定縣城內的平蕪館，係小商人張丈山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爲園，費至萬餘金。[41]又如蘇州府元和縣舉人朱綬(1789-1840)，於道光 3 年(1823)自蘇州城內幽蘭巷遷居孔副使巷，此地原爲明蘇州府長洲人孔鏞的墨池園部份，他花了五百緡購地，折算白銀約三百八十餘兩。[42]所以在城內購地，再加上建築的費用，張丈山平蕪館的「費

---

36 〔清〕戴名世，〈綠蔭齋古桂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111。

37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靈巖山館〉，頁 219。

38 如儀徵東南三十里的樸園，該園中的湖石數峰，洞壑宛轉，較蘇州的獅子林尤有過之，號爲淮南第一名園也。據說園主花費白金二十餘萬兩，經五年始成。參見〔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叢話二十・園林〉，頁 534。

39 〔清〕顧春福，〈隱梅庵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168。

40 清制 1 緡即 1,000 文，又道光 26 年江南地區銀錢比價，是白銀 1 兩合制錢 1,500 文。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831。

41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9。

42 孔鏞，字昭文。景泰五年(1454)進士，累官至右副都御使巡撫貴州。清初割其宅爲織造局，其餘爲李之先所得。朱綬所居乃李氏園一隅。〔清〕朱綬，〈移居第二圖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107。又銀錢比價的折算，根據道光 8 年蘇松地區的標準，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831。

至萬餘金」就一點也不誇大了。這都說明了在縣城要營造一個還不錯的園林，花費相當驚人。此外，園林之所以難維繫，也和維修經費驚人有關。梁章鉅就曾言及杭州第一名園金衙莊，他在杭州時曾有意購此園，但思量後作罷，蓋因修理費用龐大，非其財力所及。據其自稱：「時余方在城中相宅，有爲此園蹇修者，謂但得二千緡之價便可賃居，余謂二千緡價本不昂，但修理之費亦非二千緡不辦，非力所能任，因置之。」[43]概言之，花費數百兩至十萬餘兩來營造園林，無疑地已成爲當時奢侈浮華的表徵。

二、社會的觀感與批評

明清江南大城市內的人口與住家相當密集，所以想在城市內蓋園林，需要購買附近大批的房屋土地，這遠比在郊外或鄉村蓋園林時，購買空地或田地的價格要來得貴，而且困難度更高。明清以來有不少關於在城市築園林第宅，而與鄰人發生爭執或糾紛的故事。如《花當閣叢談》中有一則描寫弘治朝曾任吏部尚書的屠滽(1441-1512)辭官後，回鄉營建第宅，「規畫已定，宅前有老嫗敗屋兩楹，適當門址，屢使人從容譬說，欲劵之，嫗堅不從。」[44]據該書作者徐復祚(1560-1630？)的評論指出，這種現象在江南很普遍：

> 此事雖不逮蘇文忠公還劵，然亦今人所難，尤為吳中人所難。今有吏部尚書府第前，乃容一寡老婦借居者乎？即主人不言，門幹狠僕，亦必多方遣逐之矣。聞江陵相公〔按：張居正〕在位，欲買鄰居蓋宅，其人死守不肯去，有荊州府同知某者，私為款曲其人，倍直與之，歸劵江陵，同知遂得陞荊州知府。[45]

官員士大夫爲了築園林而購買鄰人屋地時，其下屬或僕人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迫使鄰人出售宅地，可見當時高官營建第宅時常會出現這類情況。還有官紳在

[43]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卷1，〈金衙莊〉，頁6。

[44]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台北：廣文書局，1969），卷3，〈屠太宰〉，頁39a。

[45]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屠太宰〉，頁39b。

營建第宅時，甚至動用鄉人充當徭役，如同書中記載松江府的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責供焉。」[46]

吳寬就曾為文批評蘇州畫家杜瓊(1596-1474)，指其在城內營建園林之舉，實乃欺凌弱夫貧婦之鄰者，且築園既浪費人力，又使田地無法復耕，必定會遭致民怨，其云：

> 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陀矣，則疆畎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47]

在明清的筆記中充斥著縉紳富戶透過強迫的手段取得土地權，行徑如同豪強一般。例如前述拙政園係御史王獻臣在原大弘寺舊址拓建而成，明末清初人徐樹丕(1596-1684)所撰的《識小錄》一書中，卻記載園主王獻臣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

> 拙政園在婁門迎春坊，喬木參天，有山林杳冥之政，實一郡園亭之甲也。園創於宋時某公，至我明正嘉間，御史王某者復闢之。其鄰為大橫寺，御史移去佛像，趕逐僧徒而有之，遂成極勝。相傳御史移佛像時，皆剝取其金，故號「剝金王御史」。末年患身癢，令人搔爬不快，至沃以沸湯，如此踰年，潰爛見骨而死。其子即貧，孫某至於弔喪為業，余少時猶識之。當御史歿後，園亦為我家所有。[48]

因為徐樹丕的曾叔祖徐少泉曾以千金與王獻臣之子約賭，並以拙政園為質，而獻臣之子賭輸，園遂歸徐氏，故云：「園亦為我家所有」。又如清人姚廷遴(1628-1697)《歷年記》描寫清初松江府城鄉紳黃機右，「當此盛時，竟不做好事。住宅周圍，遍買居民房屋，拆去改花園，不論人家願與不願，蓋以勢壓之，

46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錢尚書〉，頁37b。
47 〔明〕吳寬，〈重建延綠亭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20。
48 〔清〕徐樹丕，《識小錄》（台北：新興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佛蘭草堂手鈔本影印，1985），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40冊3，卷4，〈拙政園〉，頁560-561。

故使人甚有恨者。」[49]

明清的筆記有不少論述是在嘲諷築園的士大夫，像是前述有築園之癖的王世貞與倪元璐，都成了被嘲諷的對象。謝肇淛(1567-1624)就曾批評道：「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近於淫矣。」[50]《戒庵老人漫筆》記載太倉王世貞的弇州園築成後，有人題詩於壁上嘲諷他，其詩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指王世貞的父親王忬(1507-1560)，因和嚴嵩(1480-1567)結怨，以致死於西市，但身為人子卻熱中於興築園林，故諷其行徑如同「化悲慟為逸樂」。[51]前述倪元璐愛構園亭則是另一個成為笑柄的例子，清人王應奎(1684-1757)《柳南隨筆續筆》就記載他因為太愛構園，當時有徽州墨匠方于魯、程君房二人以製墨著稱，倪氏嘗以方、程所製之墨調合朱砂，塗於門窗及牆壁。他向任職於徽州府推官的門生魯元寵多方索取，元寵只得遍覓以應之，然而隔數日又索，所以元寵不耐煩地說：「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又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他嘗以此自鳴得意地說：「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為何如？」所以王應奎嘲諷地說：「其可笑如此！」[52]

這些對園林主人的批評與嘲諷，說明了晚明以來競築園林以誇示炫耀的風氣，違反儒家傳統以來崇儉黜奢的觀點，於是引發社會的批判。尤其是在城市修築園林的展示效果更強，更易成為社會輿論批評的對象，對園主的社會觀感也隨之呈現負面的形象。所以明清還出現另一類著作，強調以炫耀財富與社會地位為目的園林，轉眼間就成了荒煙蔓草。藉著描述園林的衰敗來提醒世人窮究奢華的下場，要不是富不過三代而轉手，就是引起後代對家產的爭奪。

晚明以來已有不少士大夫認為應該以此為戒，如張瀚(1510-1593)在《松窗

49 〔清〕姚廷遴，《歷年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歷年記下〉，頁 126。

50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 3，〈地部一〉，頁 73。

51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5，〈嘲弇園〉，頁 190。

52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卷 2，〈倪文正公〉，頁 169-170。

夢語》提到杭州的名人園林時就說：「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按：指沈銳，成化 5 年[1469]進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錢都憲江樓（按：指錢宏[1476-1536]，正德 3 年[1508]進士，累官至副都御史），皆身歿未幾，故廬已屬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雖位臻崇秩，後人踵事奢華，增構室宇園亭，窮極壯麗；今其第宅，皆新主矣。」[53]到了清代，這樣的警語更多。如清人陸文衡(1587-1665)也說：「士宦顯盛，必求美宅，置園亭以爲樂，不一再傳，子孫零替，輒爲遊客借憩，官府布施之地，甚至有沒作官房，鞠爲蔬圃者，轉眼桑滄，可勝太息。」所以他勸人：「卜宅在城則慎，臨水則便，勿爲雕峻，則易於修葺，勿太恢大，則後人可守。」[54]清人李漁(1610-1680)所撰之擬話本小說《十二樓》，其中的《三與樓》乃作者自寓之作，其第一回開頭即提到造園林與賣園：

> 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此傳舍蘧廬，沒有千年不變的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裏爛賤的送與別人，不若自尋售主，還不十分虧折。[55]

接著作者又提醒世人將園林留給不肖後代，一遭賤賣就有許多議論與惡名出來，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錐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孫白手創起家來。[56]

除了家道中落以致園林易主之外，園林還可能因爲兵禍而遭殃。如前述清人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指出晚明松江府園林之盛，但也指出了兵災的影響：

> 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盡飛灰，繼之列營牧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為荊榛瓦礫之場。間或僅存百一，而胥原之後，降于圭竇華門，王謝堂前，多非舊時燕子，始知蕭李二相，良足師也。然金谷樓台，鞠為

---

53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7，〈風俗紀〉，頁 140。

54 〔清〕陸文衡，《嗇菴隨筆》（台北：廣文書局，1969），卷 5，〈鑒戒〉，頁 4a-b；卷 1，〈格言〉，頁 4a。

55 〔清〕李漁，《十二樓》（台北：三民書局，1998），《三與樓》，「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　圖產業欲取先予」，頁 42。

56 清人袁景瀾(1804-1880)在遊蘇州諸家園林後也歎道：「大抵豪貴子弟習睹奢靡，服鮮騎肥，萬錢下箸，不知撙節，遂至喪家。」見〔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卷 3，〈三月・清閒明園〉，「袁景瀾春日遊吳郡諸家園林記」，頁 107。

茂草，平泉花石，終屬他人，理勢必然，其可若何？[57]

有的極端例子還顯示園主可能因爲炫耀過甚，不但會引起社會輿論的批評，又會遭仇人藉機誣陷入罪，園林第宅也就因此而毀。如《戒庵老人漫筆》記載一則明代發生在常州府江陰縣的事件，該事件主角是嘉靖年間曾任廣西道御史的錢籍。他在該縣內有甲第莊所，大小四十餘處，其它田畝、財貨與家口無算，「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廄馬之盛，莫可殫述」。可是卻在數日之間，「悉爲鄉里豪強輩群起而分拉之」。作者分析其原因，錢籍實無貫盈大罪，只因其世居傍江，爲防鹽盜出沒，收有許多健僕壯子；這些人等係游惰頑民，平時恃勢放恣，而錢籍也漫不檢察。於是當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錢家爲窟穴，遽爲士流所唾罵，仇家又起而誣告，以致上官亦駭於耳目，錢氏遭罪終不能免也。所以作者最後歎道：「於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58]

三、士大夫築園的理由

從明清文人所撰的〈園林記〉中，可以看到這些〈園林記〉的作者也會批評當時競築奢華園林之風。蘇州的〈園林記〉就有不少例子，批判耗鉅資築園卻不知守家的奢侈行徑，乃是庸人所尚，園林終究會因後代敗家而化爲蔓草。如錢穀(1508-1572)的〈跋師子林圖冊記〉云：

> 追維郡中貴家富室，園池亭館，珍木怪石，巧取詭奪，爭勝一時，誇耀人目，身死之後不一二年，煙銷灰滅，莫知其幾。……後之攬者，亦不能不起廢興之感於懷也。[59]

汪琬的〈姜氏藝圃記〉也指出：「吳中園居相望，大抵塗飾土木，以貯歌舞，而誇財力之有餘，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蕩爲冷風，化爲蔓草矣，何

57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 10，〈居第一〉，頁 208。

58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 4，〈海山覆敗〉，頁 154-155。

59 〔明〕錢穀，〈跋師子林圖冊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34。

足道哉！何足道哉！」[60]拙政園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待園主王獻臣死後子孫貧困，該園轉手多次；至清初順治 10 年(1653)，賤售與海寧相國陳之遴(1605-1666)，得價二千兩，只値原價的五分之一，[61]所以沈德潛〈蘭雪堂圖記〉就說：

> 西鄰之拙政園，據于鎮將，歸相君，其窮極奢麗，視蘭雪直邾莒耳！然熏天之焰，倏焉撲滅，易三四主，而莽為邱墊，蕩為寒煙。即欲寄之圖畫，而狐兔縱橫，不堪點筆。豈非汰侈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長存歟？[62]

獅子林亦是如此，所以袁學瀾（又名景瀾，1804-1880）在〈游獅子林記〉中歎道：「昔人以營造鉅麗爲土木之妖，獅林以名著而屢經易主，然則爲園囿者，亦無取乎美好，以致後人不能守也。」[63]

汪琬自己在蘇州城郊的橫山蓋了一座園林，命名爲堯峰山莊，並自撰〈記〉，文中稱其仰屋而嘆，「蓋嘆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尤難也。後之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接著批評當時蘇州的風氣：

> 吾吳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教，其子弟類皆輕狷巧詐，不率於孝友，而中間尤無良者，又多移為服御、飲食、博奕、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興亦易替，數傳而後，無貸不給，有不墟其先人之隴，而剪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64]

以上汪琬的說法是針對蘇州士大夫築園風氣所提出的警語，而韓騏(1694-1754)〈安時堂記〉，則是將對象轉向蘇州一般庶民的築園風氣：

> 近見，販負廝養之有財者，誇一時之都麗，刻桷丹楹備輪奐，甚至侈樓台，貯歌舞，好事者為之賦詩紀事，比於金谷、午橋之勝。無何而泣葉啼花，幾易主，而不知為某某之故宅者，由其越禮犯分，於安命

60 〔清〕汪琬，〈姜氏藝圃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84。
61 〔清〕徐樹丕，《識小錄》，卷 4，〈拙政園〉，頁 560-561。
62 〔清〕沈德潛，〈蘭雪堂圖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06-107。
63 〔清〕袁學瀾，〈游獅子林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36。
64 〔清〕汪琬，〈堯峰山莊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23。

> 順時之旨，悖焉不顧，斯朝華夕萎耳！[65]

明季復社高士顧其蘊於蘇州築寶樹園，其孫又築安時堂於宅中，這篇文章本是爲之而寫的。但文脈中卻可見作者要批判的一方面是「販負廝養之有財者」，也就是有錢的商人爲誇示炫耀而「越禮犯分」競築園林；還有所謂的「好事者」，也就是一些爲商人寫文章賺潤筆費的文士，他們助長此風，卻不知園林守成不易，很快就會易主。

不過，〈園林記〉的作者同時也會提出許多築園的理由，來爲自己或友人的園林辯護。在明代前中期留下來的少數〈園林記〉，已可以看到作者自陳築園的理由。如蘇州城內西南邊原有宋代朱勔(1075-1126)所築之同樂園，至明代爲廬山陳惟寅所得，更名爲「綠水園」，高啓(1336-1374)爲之作〈綠水園雜詠序〉云：

> 惟寅雖窮居隱約，而能以詩書世其業，篤於孝友，其清德雅操，固可以蔑視勔矣，則余為之執筆，亦可以無愧焉，因不復辭，且庶幾或傳，使父老知園之更名綠水者，自惟寅也。[66]

高啓強調「窮居隱約」、「以詩書世其業」與「篤於孝友」等說法，可以看成是士大夫築園的典型理由。日後主張興築園林的士大夫，大多也是沿用這些說法。然而，晚明以來，興築園林成爲社會輿論批評的奢侈行徑後，〈園林記〉的作者除了沿用過去的說法以外，還必須強調園主的本意與當時誇示炫耀的作風有所區別。

道光 6 年(1826)梁章鉅調任江蘇布政使時，重修在滄浪亭對門的可園，朱珔(1769-1850)寓居於此作記，指出：「世之置園者，率務侈曲榭崇樓，奇花美木，不可殫狀，而今殊樸略」，所以樸素才是可園的特色。[67]又如清代諸生袁學瀾於咸豐 2 年(1852)購得蘇州葑門官太尉橋西之廬氏舊居，營爲園宅，自題「雙塔影園」，並自撰〈記〉云：

[65] 〔清〕韓騏，〈安時堂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10。
[66] 〔明〕高啓，〈綠水園雜詠序〉，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51。
[67] 〔清〕朱珔，〈可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02。

吳中固多園圃，恒為有力者所據。高台深地，雕窗碧檻，費貲鉅萬，經營累年，妙妓充前，狎客次坐，歌舞乍闋，荊棘旋生，子孫棄擲，蕪沒無限，殆奢麗固不足恃與！今余之園無雕鏤之飾，質樸而已，鮮輪奐之美，清寂而已。[68]

他刻意地將其園林形容成「無雕鏤之飾」、「質樸而已」、「清寂而已」，與蘇州「有力者」園林的奢麗作對比。[69]

除了強調質樸的風格以外，築園以娛親盡孝也是常見用來作爲區隔奢麗園林的理由。如正德朝曾任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鏊(1450-1524)，因當時大權悉歸劉瑾(1451-1510)，王鏊遂力求去官歸鄉。其子王延哲在蘇州西城橋買地辟園以娛之，名之爲「怡老園」。晚明名士文震亨(1585-1645)所作之〈記〉即稱讚此舉，開頭便說道：

園林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以文章著，不若以子孫著也；以子孫之貴顯，不若以子孫之忠孝著也。……嘻！以余所睹，記園林之以忠孝著者，百不遘一矣！[70]

蘇州府內還有不少類似的例子，如明代杜瓊的如意堂，即其奉母之堂也；清人李果(1679-1769)所建的萊圃，係其「奉老母以居，又竊取老萊子娛親意也」；嘉慶年間里人錢炎得蘇州城郊木瀆鎭之潛園爲別業，又名桂隱園，原爲承其父志，「買園移蘭以娛老」。[71]

也有人強調園主退隱居園的閑情生活，與當時社會以園林侈靡相爭之狀作一對比。康熙年間任吉安知府的吳銓，年未老即乞假歸，於蘇州城郊之木瀆鎭

68 〔清〕袁學瀾，〈雙塔影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61-262。

69 在北京也有類似的例子，如〔明〕薛岡，《天爵堂筆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 5 輯，卷 3，頁 347-347，云：「長安富貴之場，院囿亭台，無不侈麗，獨米氏海淀勺園，一洗繁華蔫徑，板橋帶以水石，畝宮之內，曲折備藏，有幽人野客之致，所以爲佳。」

70 〔明〕文震亨，〈王文恪公怡老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66。

71 〔明〕徐有貞，〈如意堂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20；〔清〕李果，〈萊圃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63；〔清〕沈欽韓，〈木瀆桂隱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69-170。

構遂初園，沈德潛(1673-1769)爲之作〈記〉稱：

> 太守於四時佳序，逍遙杖履，涵詠太平；胸懷所樂，若有一己獨喻，而不必喻之人人者，是豈無得於中者而能然與！然則林園景物亦寄焉而已，而人世之侈靡相高，徒有羡於金谷、銅池之華者為足陋也！[72]

前者強調以金碧著稱的園林，遠不及以忠孝著稱的園林。後者強調林園景物的功能，應該是在涵詠隱居的閑情生活，而不是徒以侈靡相高。兩者都在凸顯該園林與流行的奢華園林之差別。[73]

有的士大夫仍在仕宦任內時，就已致力營治園林，對於外界的批評，他們提出園林具有另一種實用性的功能。例如蘇州城著名的名園滄浪亭，原是宋慶曆年間蘇舜欽(1008-1048)所築，清代由江南巡撫宋犖(1634-1713)重修，他在〈重修滄浪亭記〉一文中，強調遊園林不會妨礙政事：

> 或者疑游覽足以廢政，愚不謂然，夫人日處塵坌，困於簿書之徽墨，神煩慮滯，事物雜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清冷之域，寥廓之表，則耳目若益而曠，志氣若益而清，明然後事，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74]

對外界質疑其建園林遊覽「足以廢政」，宋犖提出解釋。他認爲園林的景致可以讓人心曠神怡，頭腦清醒，辦起政事反而更有效率。

士大夫或文人特別喜歡在〈園林記〉中，凸顯他們的園林與其他園林之不同處，也就是在於有沒有「文藝活動」。如明季諸生湯卿謀(1620-1644)在蘇州城郊館娃里所居之書齋，命名爲「荒荒齋」，並自撰〈荒荒齋記〉以說明其築園林並非奢侈荒淫之理由：

> 齋雖荒，視彼荒於婚宦聲色，荒於酒肉貨賂者，固當有辨。況今遙睇

---

72 〔清〕沈德潛，〈遂初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37。

73 有的例子確實是築園爲享樂，但在晚明士大夫的筆下，又將玩樂說成是隱居而憂天下。如長洲知縣江盈科(1553-1605)爲徐泰時的園林，撰有〈後樂堂記〉，描寫徐泰時築園的動機是：「皆挾有爲之具，不遇可爲之時，固逃於酒於色以自遣耳。」參見〔清〕江盈科，〈後樂堂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50。

74 〔清〕宋犖，〈重修滄浪亭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41。

大江以北，其得築室草間，擁書南面者，幾何人哉？[75]

他自陳乃「擁書南面者」，與一般築園林荒於「婚宦聲色」、「酒肉貨賂」者不同。又如清代庶常顧嗣立(1699-1722)於蘇州閶邱坊巷築秀野園，聚賓朋酬唱於此，又於該園出版《元詩》。清初鴻儒朱彝尊(1629-1709)爲其作〈記〉云：

思夫園林丘壑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伎充於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無歌既闋，荊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述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76]

朱彝尊指出富室所築的園林如同過眼雲煙，惟有「學人才士述作之地」的文人園林，才可以長留天地之間。

晚明以來士大夫或文人築園，也許其本意真的是爲隱居，然而一旦築園演變爲炫耀財富與成就的行徑，園林無異成了奢靡風氣下的產物，此時園林主人就得直接面對社會輿論的批評。當社會現狀與原來士大夫的理想愈來愈遠時，士大夫與文人一方面在〈園林記〉書寫中直接批判當時競築園林之風，同時在強調園林主人築園的動機時，極力與當時誇示炫耀之風劃清界線；並且著重在園林的意境、實用性與文藝活動等方面，以之與「他者」的園林作區分，進而合理化他們築園的行爲。

四、「文人化園林」的書寫建構

明清部份的文人與士大夫除了批評「他者」的園林，並刻意與之區分之外，還積極地透過園林文本的書寫，企圖嘗試建構他們理想中的園林，筆者稱之爲「文人化園林」。本節嘗試透過〈園林記〉與筆記的文本分析，顯示這類文本在書寫上所強調的兩個面向，一是在園林所舉行的文藝活動，一是園林所具備的幾種物質文化；前者是動態的活動，後者是靜態的物件，藉此來說明「文人化園林」建構的模式。

---

75 〔明〕湯賓謀，〈荒荒齋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18。

76 〔清〕朱彝尊，〈秀野堂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83。

文人化園林的文藝活動

前已提及〈園林記〉的文本在描述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園林中舉行的各種文藝活動。園林的文藝活動不只是區隔「他者」園林的要素，而且還是「文人化園林」的重要標誌。清人錢大昕(1728-1804)〈網師園記〉就說：

> 然亭台樹石之勝，必待名流宴賞，詩文唱酬以傳，否則辟疆驅客，待貧後人嗢噱〔按：大笑〕而已。[77]

他在〈寒碧莊宴集序〉中也說：「予惟園亭之盛，必假名流觴詠，始能傳于不朽。」[78]錢大昕指出園林所以能知名、能傳世，正是因為有文人名流在此宴賞，並為之賦詩為文。換句話說，園林要有許多文藝活動，才是合乎「文人化園林」的標準。這樣的說法在士大夫與文人間頗為普遍，如錢泳(1759-1844)在〈文待詔拙政園圖題跋〉中也說：「余嘗論園林之興廢有時，而亦繫乎其人。其人傳，雖廢猶興也。惟翰墨文章，似較園亭為可久，實有不能磨滅者。」[79]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關於園林的記載，有許多是描述園主常以園林招待文人雅士宴遊，藉此與他們相結交。如明末清初蘇州著名的經學與書法家褚篆(1580-1676)，為新會知縣顧嗣協(1663-1711)所構建的依園作〈記〉，就曾說道：「我吳鄉先生，以風雅自命，饒園林詩酒之樂者，惟考功雅園顧公為最著」；「揮金結客，邑之宿老、詩翁，及四方騷人、韻士，畢延而置之座上，一時詩酒留連之盛，品竹彈絲之勝，聲噪大江南北，顏之曰依園。」[80]明清蘇州的拙政園可作代表，最初的園主王獻臣與吳門畫派著名大家文徵明(1470-1559)交往甚密，文徵明還曾為拙政園作詩文圖畫。之後園東歸王心一(1572-1645)的歸田園，亦成為文人雅集的勝地，可與王獻臣的拙政園媲美。迨清代該園多次易主，到了吳三桂之婿王永寧時，曾經邀請當時的戲曲家余懷(1617-?)、李漁等人到該園中宴集，並觀看家姬演劇，余懷有多首詞記其事。至乾隆初年(1736)園又

---

77 〔清〕錢大昕，〈網師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95。

78 〔清〕錢大昕，〈寒碧莊宴集序〉，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53。

79 〔清〕錢泳，〈文待詔拙政園圖題跋〉，轉引自王宗拭，《拙政園》（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8），頁 141。

80 〔清〕褚篆，〈依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80。

分爲中部的復園與西部的書園，復園爲知府蔣棨所修建，當時園中春秋佳日，名流觴詠，極一時之盛，詩人、學者如袁枚(1716-1797)、趙翼(1727-1814)、錢大昕等相繼來此流連賦詩，曾有〈復園嘉會圖〉傳世，沈德潛爲之作〈復園記〉，袁枚還有〈宿蘇州蔣氏復園題贈主人〉詩。[81]也有園主非常慷慨地將園林借給官員或士大夫，提供他們作爲文人雅集的場所。如梁章鉅在任江蘇巡撫時，曾招諸友人借蘇州瞿園（即原網師園舊址修建後改名）中看芍藥，並約以詩記之、以圖繪之。他又曾借杭州的長豐山館，招官宦友人宴飲作詩。[82]錢泳曾於乾隆55年(1790)借蘇州城郊的靈巖山館，與諸友人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極文酒之歡。[83]

園林不但是文人雅集的場所，在園林中還成立有不少詩文社，以園林爲題材賦詩成卷。如清蘇州府長洲縣人陸錦，官至四川保寧府知府，他於婁門內小新橋巷築涉園，「間於花之晨月之夕，與校長虞東皋、同郡顧芝庭、繆南有、蔣西原諸先輩結詩酒之社，選歌徵舞而外，各有詩一卷，爲四方所傳誦。」[84]園主會將這些唱和的詩文集結，並以園林的名稱當成詩文集的書名出版，《滄浪小志》可作爲代表。該書是因清人宋犖(1634-1713)任江蘇巡撫時重修滄浪亭舊址，遂將前人傳記詩文附以近人的詩文共爲一集。這本看似園林志的專書，其實體例與內容上都與一般的方志不同，共分二卷。上卷有傳、志、詩、記、序、誌銘以及祭文，大多是滄浪亭的創始者宋人蘇舜欽所作的詩文，或是與之有關的資料，反而關於園林本身的記載不多。下卷則是蒐集宋犖自己所撰的記與詩，此外，還有一大批當時名士與官員曾受邀遊園後所撰的詩賦，這些人包

81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4。蘇州另一個例子是位在閶門內後板廠的繡谷園，係清初朔州知州蔣深(1668-1737)所築。康熙 38(1699)年，園主曾邀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據稱坐中亦是名宦、諸生、畫師與方外名人群聚。江南其他城市的園林亦不乏這類活動的例子，如清代杭州湧金門外的長豐山館，係郡人朱彥甫舍人得王氏別業而擴充之，據稱園主豪邁好客，每於春秋佳日，與郡中諸名宿載酒題襟。參見〔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5、542。

82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卷 1，〈瞿園〉，頁 221-222；卷 1，〈長豐山館〉，頁 241。

83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8。

84 〔清〕程章華，〈涉園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88。

括了尤侗(1618-1704)、陳廷敬(1638-1712)、王士禛(1634-1711)、朱彝尊、范承勳(1641-1714)、邵長蘅(1637-1704)、顧貞觀(1637-1714)、顧圖河(1655-1706)等等。[85]

上述的這些文藝活動，充份說明了建構文人化園林的動態模式，從邀請文人雅士遊觀園林、與地方名士唱和詩文、進而將著作出版等方式，這不但是一種文化名聲的建構，其實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建構，如此才能將園林及其主人的聲望與影響力量擴大。

園林內的物質文化

園林文本的記載所描述的重點，除了上述的文化活動以外，還會提及園林內部的物質部份。不過，對於建築物本身的描寫並不細緻，通常只是列舉出亭台樓閣的名稱而已。令人印象更深刻的，則是這些記載往往提及園林內的其它一些特殊物件，大致上來說可分爲三類：一類是裝飾物，包括了奇石、異植（花草與樹木）等；另一類是收藏物，如奇書、名畫、古董、古物等等。另外，還常會花上大半篇幅在描述一種展示物，特別多是題匾與石刻。以上的這三類物件構成了明清江南園林文化中重要的物質文化部份。

第一類的裝飾物以異植與奇石爲大宗。明中葉以後，蘇州園林內的植物，不再像明前期是具有經濟價值的農藝作物，而是以稀有、珍奇的花木爲主，甚至很多是從東南亞輸入的外來植物。[86]爲了凸顯園林內擁有這類異植花木的描述頗多，如蘇州拙政園內有連理山茶樹一株，已載入《蘇州府志》，清代著名詩人吳偉業(1609-1671)並有詩記之；[87]清代蘇州的獅子林，有合抱大松五株，

85 〔清〕宋犖編，《滄浪小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甲申10年(1884)江蘇書局刊本），共二卷。

86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pp. 71-72.

87 清代詩人吳偉業撰有〈詠拙政園連理山茶並引〉云：「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連理，得勢增高。每花時，巨麗鮮妍，紛披照矚，爲江南所僅見。」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95；〔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3-524。〔清〕張紫琳，《紅蘭逸乘》，〈咫述〉，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上冊，卷 3，頁 286-287。

故又名五松園。[88]而異植與奇石之美，也是園林重要的景觀。如蘇州城內的姜氏藝圃，在汪琬的〈姜氏藝圃記〉中形容道：「至于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與晻靄乎几席之下；百歲之藤，千章之木，干霄架壑。」[89]在錢泳的《履園叢話》一書中，還提到蘇州樸園中百花齊發、群豔爭芳，以及網師園中的芍藥等美景。[90]

一般的園林通常也都有種植花木，但是關於文人化園林的記載，除了重點描述異植與其美景之外，也會強調這些異植花木是園林主人親手栽種。錢泳在《履園叢話》所描述的園林，就有不少例子特別強調這方面。[91]再者，所描述的異植，往往進一步地擬人化，成為具有靈性的花木，於是在明清文人的筆記中常出現花神有靈、不負主人的故事。如明人薛岡《天爵堂筆餘》記載一則故事，描述某第宅主人親自種植的槐樹，頗有靈氣，隨著第宅主人家道中落，第宅轉手他人，而槐樹也無故漸枯。[92]

奇石和花木一樣都是園林中不可少的裝飾物。明前期的園林中甚少有這類奇石，如文徵明〈王氏拙政園記〉中就無此記載。論價格與稀有度，奇石更勝過異植，所以奇石已成為當時人們鬥麗爭勝、誇示炫耀之園林必需品。[93]關於蘇州園林的記載中，有許多是著重這類奇石的描述。如太倉王世貞的弇山園，至清代改名五畝園，「因水鑿石，石嶙峋若天生」；[94]蘇州閶門外的寒碧山莊，「園中有十二峰，皆太湖之選」；[95]蘇州城東北隅的獅子林，更是以眾多奇石

88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3。

89 〔清〕汪琬，〈姜氏藝圃記〉，收入柯繼承，《藝圃》（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頁 140。

90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6。

91 如蘇州拙政園東邊有歸田園，為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園中一花一木皆其親自培植；太倉州城南有南園，為明代萬曆年間首輔王錫爵所築，至清中葉尚存老梅一株，曰瘦鶴，亦園主手植也。紹興府治東南一里許有青藤書屋，係明代著名畫家徐渭(1521-1593)故宅，地名觀巷，內有青藤者，木連藤也，相傳為徐渭手植，因以自號。參見〔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4、頁 539、頁 544。

92 〔明〕薛岡，《天爵堂筆餘》，卷 3，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 5 輯，頁 348。

93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pp. 73-75.

94 〔清〕余懷，《三吳游覽志》，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頁 868。

95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9。

林立而著名，所謂：「地以林名者，有竹萬竿成林也；林以師子名者，緣竹外多怪石如狻猊狀也。」[96]最常見的奇石就是太湖石，明清的江南流行在園林疊太湖石成山峰狀，當時的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爲築峙奇峰陰洞」[97]；寒碧山莊主人劉恕(1759-1816)酷嗜湖石，其亦云：「近日郡中好事家搜求湖石，得一舊峰，稍有可觀，即爭相稱道。」[98]更有甚者，以高價專求舊之太湖石，計成(1582-1642?)《園冶》就說：

> 世之好事，慕聞虛名，鑽求舊石。某名園某峰石，某名人題詠，某代傳至於今，斯真太湖石也。今廢，欲待價而沽，不惜多金，售為古玩還可。又有惟聞舊石，重價買者。[99]

明清江南流傳最有名的太湖石，就是關於「瑞雲峰」，有不少故事與傳說談到它輾轉流離於不同園林主人手中。[100]

不過，當時有文人強調的園林疊石，就像上述計成的批評，指出並不是價高的湖石就可以襯托出園林之美；同樣地，人工化過度的疊石也不足取。明人顧天敘〈晚香林記〉就說：

> 今之好事家，不遠千百里，陸輦水運，致石園圃，殫人巧以奪天工，豈知人不勝天，假不勝真，而石之有當於予者，正喜其天真自然，純以拙勝也！[101]

又如謝肇淛提到園林的奇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

96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卷，〈師子林〉，頁 222。

97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上冊，頁 318。

98 〔清〕劉恕，〈晚翠峰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54。

99 〔明〕計成著，趙農注釋，《園冶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卷 3，〈選石・舊石〉，頁 250。

100 據云富甲一方的明代尚書董份，於構築園林時，曾重金購得一太湖石，舊名「瑞雲峰」，一說高三丈餘，一說高五丈，妍巧甲於江南。該石中每夜會顯現光燭，人以爲神物矣。後來此石爲太僕少卿徐時泰所得，置於其所築之東園，園中另有一石，特立三四丈，俗稱「觀音峰」。至清代兩石皆棄置於踹布坊隘巷中，後瑞雲峰舁入織造府行宮，但觀音峰仍棄置隘巷中。參見〔明〕袁宏道，〈園亭紀略〉，收入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上冊，卷 4，頁 180；〔清〕顧祿，《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卷 8，頁 633-634；〔清〕韋光黻，《聞見闡幽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頁 710。

101 〔明〕顧天敘，〈晚香林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88。

然致矣」；他對吳中園林疊石成假山，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鬥麗，勿太巧喪真。」[102]由此可見，他們選石佈置園林的標準，也刻意跳脫當時流行的作法，追求一種品味的塑造。[103]

第二類收藏物包含了書畫與金石碑刻等物件，是園林重要的文化標誌。明代文人有關住宅的論述中，很強調要具備有蒐藏這類物件的空間。如文震亨《長物志》卷首〈室廬〉即強調，居住除了要有「亭台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以外，還要「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才能「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望歸，游之者忘倦。」[104]可見奇花異植的裝飾品，與書畫金石的收藏品，缺一不可。而這些物件需要有書房來蒐藏，〈園林記〉多會記載園主在園林中蓋藏書樓或書齋，如蘇州城內的姜氏藝圃，「築重屋以藏弆主人遺集，曰諫草樓」；清代劉恕修築寒碧山莊，「平池涵漾，一望渺彌，因其舊而擴之，更增地方，廣建傳經堂，即蓉峰（按：劉恕，號蓉峰）舊居之名也，藏先世圖書其中，以志紹述」；[105]蔣棨的復園據說也是藏書萬卷，所以袁枚的詩云：「人生只合君家住，借得青山又借書。」[106]

除了藏書以外，部份園林的書齋壁間刻有園主與其友人的詩文，還有大量的古代著名文人之書法。明清蘇州園林的一大特色，就是園中的書齋壁間嵌有所謂「書條石」的名家書法集帖。如寒碧山莊的主人劉恕將文章鐫刻在青石上嵌入牆壁，「書條石」就成了該園的一大特色。現存的三百七十多方書條石，根據內容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關該園林歷史的文獻，另一類是歷代名家的法帖。明清時期，蘇州文人匯刻集帖蔚然成風，該園法帖碑刻即是這種風氣的產物。[107]

---

102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3，〈地部一〉，頁72-73。

103 有關於晚明士人撰述園林文本，並試圖建構美學品味的研究，參見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pp. 166-176.

104 〔明〕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1，〈室廬〉，頁1。

105 〔清〕汪琬，〈藝圃後記〉，收入柯繼承，《藝圃》，頁141。

106 〔清〕范來宗，〈寒碧莊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245。

107 又如滄浪亭牆壁的碑石被譽為該園的勝景之一，不僅品類多，有碑記、文跋、圖像、石額、石

累代高官世家的園林所貯之上述收藏品，無論是種類或數量，都更爲驚人。如海寧查家之查世倓(1750-1821)，購得明代徐達(1332-1385)在光福鎮之耕魚軒故址而擴治之，改名鄧尉山莊。園中有廳事五楹，名爲「思貽堂」，專爲儲藏古籍，凡「七略四部，著錄咸備」。又有「御書樓」，其中奉有查世倓祖父查昇(1650-1708)侍直南書房時，蒙賜御書的唐詩巨冊、御制〈紫葡萄〉詩大幅、御筆堂額、楹聯及字畫碑刻硯墨等物品，又有內府秘書五百卷，係奉敕擬纂《韻府》樣本時，皇帝特別賞賜以資採輯者。還有「寶禊龕」一室，曾摹隋開皇本《禊帖》嵌石於壁，乃當時王羲之〈蘭亭集序〉最早之石刻本，可說是異常珍貴。[108]

第三類展示物包括題匾與題石。例如太倉州城南的南園，園中的繡雪堂壁間有「話雨」二字，是董其昌所書，左方又書「天啓丁卯，同陳眉公訪遜之山館聽雨題，四月七日其昌」二十二字，墨跡至清中葉猶存。[109]有時一個園林中先後就有數位名家之題匾，更顯園主的社會聲望。如明人王心一的歸田園，園內凡門堂迴廊假山等處，都有多個名人題額，包括文震孟、歸世昌（歸有光之孫）、蔣伯玉、陳元素、沈周(1427-1509)等。[110]蘇州城郊區的靈巖山館係畢沅所築，大門上的扁額「靈巖山館」爲其自書，二門「鍾秀靈峰」乃乾隆時曾任軍機大臣的阿桂(1717-1797)所書；又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乾隆朝大臣嵇璜(1711-1794)所題。[111]清人龔煒對獅子林的題額有如下的評語：

> 凡諸品題，並饒韻趣。又有名公鉅筆炳著其間，如歐陽承旨序其勝，

對等，尤以圖碑著稱，從人物小像，到園景圖，從〈滄浪五老圖〉、〈七友圖〉，到五百名賢畫像，洋洋大觀幾百幅。

108 〔清〕張問陶，〈鄧尉山莊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65-166。王羲之所書〈蘭亭集序〉相傳墨跡已殉葬於唐太宗昭陵，後來只有石刻本，包括各種翻刻和摹本的石刻，隋開皇間(581-600)曾據真跡上石，所以此拓本比後來翻刻本爲善，相傳認爲是「祖拓」，即最早之石刻本。此種壁間石刻，乃據開皇石刻之拓本所臨摹。

109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9。

110 〔明〕王心一，〈歸田園居記〉，《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01-103。

111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8。

倪高士、高太史輩賦其景物，以視南城之滄浪亭尤稱瑰偉絕特焉。[112]

由此可見明清文人士大夫對這類展示品的重視。如果有皇帝的御書題匾，更是值得大書特書。如顧苓(1627-?)，明長洲人，從錢謙益(1582-1664)學，明亡後隱居虎邱，購築塔影園，於室中懸崇禎皇帝御書「松風」二字。又如上述查世倓的鄧尉山莊，書齋門口有雍正仍在藩邸時爲其所題之「靜學齋」匾額。[113]

其實前述兩類物件也都具有展示文化品味的效果，不過卻不像題匾與題石來得明顯。題匾與題石不似前幾類物件有實質的價格，或是可以用金錢購置；因爲這類展示物是充份反映了園林主人的身分地位。更重要的是，持有這些物件已成爲江南心目中世家望族的象徵，就像清人俞樾(1821-1907)在《九九銷夏錄》中所記：

余兄壬甫嘗言：「人家聽事所懸之額，至百餘年後，書額者姓名，人猶知之，方是舊家。」余寓吳下，聽事樂知堂額，彭剛直書。客坐春在堂額，曾文正書。此兩公者，雖至三千年，人猶無不知也。[114]

這正說明了園林內的亭台樓閣，爲何總是需要有匾額，而且還要名家所撰，這才是「舊家」的證明。由此也可以明瞭，爲何文人士大夫在記載園林時，總是會鉅細靡遺地描述這類物件。所以非士大夫或文人的園林，像是商人所築的園林，園主也會央求名人爲之題匾。例如，前文曾提到的嘉定商人張丈山所築之平蕪館，也有知縣吳盤齋爲之作記。[115]這些題匾，也會隨著園林的易手而轉移，而富戶商人也往往爭購這類具有文化身分象徵的物件，以作爲自家的展示品。[116]

從上述的討論，讓我們明瞭到園林第宅內的物質文化，具有豐富而多元的象徵意義：裝飾物象徵著園林主人的財富與經濟實力，收藏物象徵著園林主人

112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下卷，〈師子林〉，頁 222。

113 〔清〕顧苓，〈松風寢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06；〔清〕張問陶，〈鄧尉山莊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65。

114 〔清〕俞樾，《九九銷夏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重印本），卷 11，〈名人書額〉，頁 131。

115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9。

116 參見巫仁恕，〈明清江南市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九州學林》，卷 5 期 4（2007 年 12 月），頁 112。

的文化品味，而展示物標誌著園林主人的身分地位。這些物件都是〈園林記〉的作者在書寫時，爲建構「文人化園林」所不可或缺的部份。

五、江南城市園林與城市空間

晚明以來興築的園林，明顯地是集中在城市裡或是附近的關廂，就像清人陳祖范(1676-1754)曾提到蘇州府常熟縣某孫氏第宅時所云：

> 邑中舊族位望通顯者不少，惟孫氏之先，兼有文翰風流林泉高曠之致。他家第宅多列通衢，孫氏獨擇虞出勝處，……（邑中）列通衢，稱甲第者，幾易其主。[117]

在《履園叢話》〈園林〉卷中有記載共五十多座清代江南名園，其中有半數以上是位在城市或城郊。[118]在文人或士大夫筆下，常描寫這些園林雖位處鬧市之中，然而進入該園林後卻宛如置身山林，就以明清蘇州爲例，蘇州著名的園林有近半數是位在城內，或是城外關廂附近。沈德潛(1673-1769)筆下的蘇州勺園：

> 園在破楚門（閶門）東，其地狹隘，其民奔利，屋宇鱗密，市聲喧雜，而勺湖之地，翛然清曠，初不知外地為闤闠者，而闤闠往來之人，不知中有木石、水泉、禽魚之勝。[119]

他又形容拙政園是「不出軒裳而共履閑曠之域，不出城市而共獲山林之性」；

---

117 〔清〕陳祖范，《陳司業文集・詩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 29 年刊本），卷 3，〈畫映雪山居圖〉，頁 17b。

118 包括江寧有城北的隨園、城東的張侯府園，蘇州有城內獅子林、拙政園、歸田園、息園（依園）、秀野園、繡谷園、懷雲亭、瞿園、涉園及城郊寒碧山莊（留園）等，常熟縣有大東門外的東皋草堂、縣西門內的壺隱園、縣北門內的燕谷，揚州在城內的園林就有康山別業、小玲瓏山館、雙桐書屋、片石山房、江園、靜修儉養之軒與樗園等，松江府城內的有塔射園、嘯園、右倪園，上海縣有城內豫園、城西的吾園，太倉州城南有南園，嘉定縣城內有平蕪館，杭州府有城南的玉玲瓏館、清泰門北的皐園、城內的潛園、湧金門外的長豐山館等，嘉興縣有城西門內的倦圃、城內的二十五峰園等等。甚至在江南的小市鎮中，也有許多園林，由此現象說明了晚明以來競築園林的奢靡風氣，已逐漸蔓延到城市之外的小市鎮。參見巫仁恕，〈明清江南市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九州學林》，卷 5 期 4，頁 79-89。

119 〔清〕沈德潛，〈勺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222。

又稱清華園是「地皆闤闠，市聲喧呶，而園之中鏡如澄如」。[120]故而當時的文人常以「城市山林」一詞，來形容城市園林。如清人顧汧(1646-1712)形容鳳池園是「蓋境不自異，因心而開，非所稱城市山林者耶！」[121]在蘇州與其他江南城市的園林有如此類的形容者頗多，茲不贅述。[122]

在城市內購建園林，除了金錢以外，還必須考量到許多客觀的條件，諸如空地的有無、購地之難易、是否能配合園林建築的地形、距離市場是否過遠等等。由此出發，園林蓋在什麼位置，也就是園林在城市內外的空間分布，當與城市不同區位的機能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以下將以蘇州為例，討論園林的位置和城市發展在空間上的關聯性。

城內的園林分布

附圖 1、2 是根據附表一、三中所列舉的蘇州城內園林位置繪製而成，從圖中可以看到蘇州城內園林分布的空間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兩代間園林的空間分布最大的差異，是由西北朝東南方向發展，這和蘇州城市內各個區位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蘇州城的經濟在元末明初的戰亂曾遭受到頗大的破壞，一度「里邑蕭然」，到了正統、天順年間，才「稍復其舊」，到成化年間「愈益繁盛」。[123]明代的蘇州城是吳、長洲二縣治共一城的都市，清代雍正 2 年(1724)則增為三縣治，即吳、長洲及元和三縣。吳縣在城西半部，長洲縣在東南部，元和縣在城東北。

120 〔清〕沈德潛，〈復園記〉、〈華清園記〉，皆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99、150。

121 參見〔清〕顧汧，〈鳳池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88

122 如龔煒(1704-1769?)描寫蘇州的東園是「去城市而入山林矣」；清人孫天寅（生卒不詳）形容繡谷園是「地去金閶不數武，然囂氛稍遠，漸即夷曠」；錢大昕形容網師園是「居雖近廛，而有雲水相忘之樂」；清人李雯（生卒不詳）形容寶樹園「至其地者，超然有城市山林之想」；錢泳形容揚州的雙桐書屋是「真城市中山林也」，又稱松江府的嘯園是「清池峭石，窈若深山，不知在城市間也。」參見〔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 1，〈東園〉，頁 34；錢大昕，〈網師園記〉、〔清〕李雯，〈寶樹園〉，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95、頁 209；〔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1、536。

123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5，〈吳中近年之盛〉條，頁 42。

明清蘇州城的東西南北四個區位，其繁華的程度，職業分工乃至於民情風俗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自明代以來，蘇州西城之吳縣境內較東城繁盛，西北區尤爲商業中心。正德以後蘇州更顯繁華，唐寅(1470-1523)在〈閶門即事〉詩中生動地描寫道：「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難畫工。」在明嘉靖 38 年(1559)左右，明人曹自守在〈吳縣城圖說〉中就指出來蘇州：「公署王室以逮商賈多聚于西，故東曠西狹，故亦西文于東也」；閶胥門一帶「僑客居多」。[124] 又如顧炎武(1613-1682)《肇域志》也形容明代的蘇州：「西較東爲喧閙，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125]明清之際，此區的繁華曾一度中斷，到清代仍是蘇州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乾隆年間爲蘇州絲織業與棉織業鼎盛時期，閶門內外綢緞莊林立，棉布業字號也多設立在閶門附近。[126]

圖 1 顯示明代蘇州西北閶門內園林數量相當多，尤以桃花塢一帶爲最。可是到了清代，從圖 2 顯示這一帶的園林數量銳減。《丹午筆記》描寫清初這一帶的情況：「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之師。領兵將軍祖大壽圈封民房以居兵，自婁門直至桃花塢寶城橋止，獨不及後廠一隅。」[127]據說因爲後廠一帶在明代有蘇家園，原是萬曆時御史蘇懷愚所建，後歸侍御李模；因李模有恩於祖大壽，所以該地得免駐軍。然而該園至清代終夷爲菜圃，當地人相沿俗稱「北園」。由此推測，可能是因爲清初戰爭兵災的影響，使得桃花塢這一帶的園林受到嚴重的摧殘，幾乎只剩下後廠一處得以安寧。清代以後僅剩後廠一隅有新築之綉谷園，係清初曾任知州的長洲人蔣深，於康熙年間所築。據孫

124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台北：廣文書局，1979），原編冊 5，〈蘇下〉，頁 11b、12b。

125 〔明〕顧炎武，《肇域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藍欄抄本），冊 5，〈江南八・蘇州府〉，頁 48a。關於明清蘇州城的發展可以參考王家範，〈明清蘇州城市經濟功能研討——紀念蘇州建城兩千五百周年〉，《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5 期，頁 74-84。

126 段本絡、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35-36、61。

127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61。

天寅（雍正二年[1724]舉人）〈西疇閣記〉描述綉谷園附近的景物如下：

> 地去金閶不數武，然囂氛稍遠，漸即夷曠，門臨清渠，後枕碧雉，高原眺望，見嘉疇數十畝，平削如掌。當春農月，荷鋤秉耒，耕耘其中者，雜遝雲合，凡田家景物，歷歷如繪。[128]

由上引文可知，原本在綉谷園外桃花塢一帶的園第，在清前期可能已淪爲田地。

蘇州城內正西與西南區一帶，是官府衙門集中的地區。包括有撫署（巡撫衙門）、臬署（按察司）、藩署（布政司）、吳縣署、長洲縣署、府學與縣學等等，皆位居於此。同時也是縉紳士大夫較集中居住的地區。康熙《吳縣志》就說：「胥、盤之內，密邇府縣治，多衙役廝養。詩書之族，聚廬錯處，近閶尤多。」[129]可知城內府縣治所在的正西與西南區是官衙區，這一區的空間恐怕早已作爲官署與官員宿舍，所以就園林數量而言，在明代不是特別多。例如明尚書王鏊的居第在城南，其別墅「怡老園」選址在靠近閶、胥之間的升平橋西北、西城橋一帶，清代以後改爲布政司衙門。此區域至清代，園林略有增加，部份是在明代園林的舊址上修建的。如明代申時行(1536-1614)的園林，到清代在其舊址上，申氏其孫申揆新建了「蘧園」，清乾隆間爲蔣楫所居，嘉慶間改爲孫氏宅；後歸汪氏，於道光 29 年(1849)新建義莊，又重修東花園，名爲「環秀山莊」。

前已提到蘇州城內「東曠西狹」，城東半部的人口遠不如西半部。城東北齊門與婁門內大街相交之處，明清兩代都聚集相當多的園林，最著名的是拙政園與獅子林。前已提及拙政園建於明代嘉靖中，文徵明〈王氏拙政園記〉一文的開頭，就敘述有園主王獻臣之所居，「在郡城東北，界齊、婁門之間，居多隙地，有積水亙其中，稍加浚治，環以林木，爲重屋其陽」等語，[130]顯見城東北區在明前期居住的人口尚不密集。至清代，此處已不再像明代是「居多隙

128 〔清〕孫天寅，〈西疇閣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59。

129 〔清〕康熙《吳縣志》（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康熙年間刊本），卷 15，〈風俗〉，頁 1。又引文與前引《肇域志》一書內容相同，應抄自該書。

130 〔明〕文徵明，〈王氏拙政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90。

地」，而是商業興盛，人口密度大增，就像清人程章華〈涉園記〉中所指稱：

> 吳城之東曰婁關，承三江之脈，故以三江之名名之。廛如列星，四方商賈輻輳，徵逐什一，環雉為市，惟恐一草一木之妨其地。求所謂梅園、筠谷、小丹丘諸勝，蓋蕩乎無復有存者焉。[131]

可能也因爲商業的發展，使得地價愈趨昂貴，園林在易主與重修的過程中不斷分化。所以明代位在此處的園林，到清代即使有重修，但規模與範圍都較前代來得小。如著名的拙政園在明末歸里中徐氏，至清初，雖由海寧陳相國之遴得之，卻又因罪入官。乾隆初，園又分爲中部的復園和西部的書院。園的西部，於光緒 3 年(1877)兩售於吳縣富商張履謙，易名爲「樸園」。獅子林雖早在元代已著名，元至正 2 年(1342)原名「獅子林寺」，歷經滄桑，不過明代時已傾圮嚴重，直到清代才加以重修，卻屢易其主。乾隆初年，寺與園分，花園屬黃氏，取名「涉園」。園中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據清人朱象賢《聞見偶錄》指稱，當時蘇州重修之舊園，均屬有名，且非彈丸俗地，但總不及蔣橋東偏之五松園，即俗稱的獅子林。[132]此外，城正東接近城牆邊緣的地區，清代也比明代有更多新築的園林。

蘇州城東南方靠近葑門一帶，向來是人口較稀疏，商業較不發達的地區。在明代雖然有不少的園林是位在葑門內偏北的地區，可是這些園林名聲與規模都並不顯眼。到了清代，因爲蘇州城內商業的發展與城內人口的激增，城內隙地所剩無幾，東南城區成了最後一塊空地較集中的地區，也是新建園林的集中區。尤其是葑門內河道與橫向的十泉街（十全街）以南的地區，直到乾隆朝初期徐揚所繪的《姑蘇城圖》中，都還有大片的田地（參見附圖 3）。[133]清代有特別多新建的名園集中於此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網師園。據錢大昕的〈網師園記〉云：

---

131 〔清〕程章華，〈涉園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88。

132 〔清〕朱象賢，《聞見偶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冊 213，頁 17b-18a。

133 《姑蘇城圖》應是徐揚於乾隆 8 年至 13 年(1743-1748)間，以候選主簿身分參與蘇州知府傅椿主持的《蘇州府志》編纂工作時所繪的。

吳中為都會，城廓以內，宅第駢闐，肩摩趾錯，獨東南隅負郭臨流，樹木叢蔚，頗有半村半廓之趣。……曩三十年前，宋光祿慤庭〔按：名魯儒，字宗元〕購其地治別業，為歸老之計，因以「網師」自號。[134]

由此可知，蘇州至清代只剩東南隅較有大片空地。到了清中葉，從葑門至滅渡橋附近也成了貿易相當繁榮的地區。據同治《蘇州府志》記載當地建滅渡橋是因爲：「吳城東南由赤門灣距葑門水道間之非渡不行，舟人橫暴侵凌旅客，風晨雨昏，或顛越取貨。」[135]而《丹午筆記》就指出這附近房屋價格的變化：

即如盤、葑兩門，素稱清靜，乾隆初年，或有華屋減價求售者，望望然去之，今則求之不得。[136]

可見當地的商業貿易活動亦頗頻繁，而該地區的地價與房價和盤門附近一樣，到清中葉都呈現上漲的趨勢。

城郊的園林分布

從附表二、五可以看到在蘇州城郊還有許多園林，大多數是位在閶門外。蘇州城西北角閶門至城外西郊的楓橋之間，是明代蘇州最繁華的地區。明人鄭若曾(1503-1570)在其所著之《江南經略》一書中有關於天啓年間蘇州商業興盛的描寫：

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兩岸，居民櫛比，而南岸尤盛。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過者爛然奪目。楓橋尤為商舶淵藪。[137]

引文說明了由閶門往西到楓橋的河道南北兩岸，在明代商業興盛，人口稠密；北岸有下塘街，南岸有上塘街，南岸尤爲繁盛。不過，這一帶到了明末清初，工商業發展稍退，就像《丹午筆記》所云：「東西洋未通，貨物寥寥，南濠亦

---

134 〔清〕錢大昕，〈網師園記〉，收入《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頁 195。

135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 9 年刊本影印，1970），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卷 3，〈津梁〉，頁 28。

136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頁 104。

137 〔明〕鄭若曾，《江南經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171，頁 60 上。

非輻輳之區；國初，湖寇揭竿，上、下塘又遭兵火。」[138]當時海外貿易還未臻全盛時期，而且明清之際遭兵災，所以盛況不再。直到康熙後期才恢復舊觀，人口漸密，地價騰貴，所以《丹午筆記》又說：「以後漸占官路，人居稠密，五方雜處，宜乎地值寸金矣。」[139]

由閶門出去往西北方向到虎邱山的這一帶，又稱爲山塘，最早是唐朝詩人白居易(772-846)在此間鑿河堆堤，築通了一條七里山塘。明代時雖已是重要的旅遊觀光地區，但是到清代更加繁榮，幾乎已成了蘇州的地標。一年從頭到尾各樣的歲時節日，在虎邱山塘就包辦許多遊觀活動。清代文人顧祿，還專門爲虎邱山塘寫了一本類似導遊介紹的書籍，名爲《桐橋倚棹錄》，書中詳細介紹這個地區的風土人情與歷史，以及遊玩重要的景觀。而且山塘街已形成固定的商業市場，所賣的東西各式各樣，許多新奇的舶來品，令人目不暇接。[140]此外，明末清初以後，棉布貿易中心由松江移到蘇州，相隨著是棉紡加工業，包括染色加工業與踹布業也移往蘇州。明末時，「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141]入清以後，山塘區的染坊與踹坊逐漸增多，甚至在乾隆 2 年(1737)官府爲了禁止染坊污水污染河道，所以下令遷移。此後染坊遷至婁門，踹坊仍在山塘。[142]

這兩個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的消長，也會反映在園林的分布上。對照附表二、五中可以看到，在明代，上、下塘街直到楓橋一帶是蘇州城郊園林數量最多的一區，最有名的園林就屬寒碧山莊（留園）了。該園原爲明人徐泰時(1540-1598)東園故址，乾隆 59 年(1794)吳縣人劉恕移居於此，重修後改名爲寒碧莊。其外園，於光緒 2 年(1876)歸武進人盛康(1814-1902)，遂改名留園。

138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頁 104。
139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頁 104。
140 〔清〕許治修，沈德潛、顧詒祿纂，乾隆《元和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 26 年刻本影印，199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卷 10，〈風俗〉，頁 8a。
141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頁 104。
142 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頁 60-61。

在明代，山塘地區的園林並不多，只有荒荒齋、塔影園和近峰別業在虎邱旁，真趣園在山塘街。可是到清代，山塘地區的園林陸續出現，數量已超過上、下塘一帶。如邱南小隱、西華別墅、蔣氏塔影園、靖園、一榭園、藝芸書舍、挹秀樓、吟嘯樓、聚遠堂、涌泉庵、程文煥宅、擁翠山莊、三溪小隱等等（參見附圖 4）。

六、江南城市園林與市民生活

明清江南城市內與城郊的私家園林，有逐漸走向對外開放的趨勢，這也使得城市園林與市民的生活逐漸地產生了微妙而密切的關係。以下就分別討論私人園林如何走向開放？園林的開放又對市民的生活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私家園林的開放與否

明清江南園林主人時常面臨的一大困擾，就是園林是否對外開放。例如錢泳友人曾購一園，他與該友人對是否開放與他人同樂，有過一番爭辯：

> 有友人購一園，經營構造，日夜不遑。余忽發議論曰：「園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園亭，有一花一石者，吾來嘯歌其中，即吾之園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積貲巨萬，買妾數人，吾自用之，豈可與他人同樂耶！」余駁之曰：「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顧眼前，儻有不測，一切功名富貴、狗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況園亭耶？又安知不與他人同樂也。」[143]

此段反映園主的目的與士大夫的社會理想有一段落差，也說明了社會輿論一定會造成園林主人的壓力。

明清以來士大夫築園者，就有不少主張開放園林給人遊覽，是一樁美事。如王世貞〈題弇園八記後〉中主張開放園林供遊客遊覽，自己也很自豪其園林因開放而著名：

143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46。

> 余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之。故盡發前後扃，不復拒游者，幅巾杖屨與客屐時相錯，間遇一紅粉，則謹趨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與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園之名日益著。[144]

而士大夫也會撰文讚賞某些園林主人將園林開放給一般大眾，提供了市民又多一處公共空間，就如同作善事一樣，值得稱道。如清人龔煒在《巢林筆談》一書中，描述他久聞蘇州東園之大名，一日終能探其勝，「闢地曠，取徑幽，樹老雲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遊完園景之後，他盛讚園主開放園林之美德：「因歎奉常先生之澤，波及遊人者多矣。」[145]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私家園林的開放，適可以提高園林主人的社會聲望。

當然，私家園林開放與否？開放到什麼程度？決定權取決於園林主人，但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很難再畫地而趨，不知變通。尤其是縉紳士大夫身分的園主，面對社會觀感與輿論的批評，除了自圓其說以外，他們得有所作為，才能擺脫奢侈的污名，讓人改變對這些園林主人的負面形象。再者，明清縉紳士大夫的園主，畢竟多少還會有儒家思想的公私觀念，與受到強調社會責任感之影響，也會嘗試透過開放園林，來扭轉社會形象，甚至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所以外部的社會壓力與士大夫內部的反省，兩相交雜之下，有越來越多的士大夫園林走向對外開放。

還有不少並非士大夫身分的園林主人，也受到影響，而傾向開放其園林。例如明清江南私人園林中有許多是商人所營造的，除了資本雄厚的大鹽商以外，也有小商人。如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載一則嘉定小商人營建園林的故事：

> 嘉定有張丈山者，以貿遷為業，產不踰中人，而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許，張恚甚，乃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為園，費

144 〔明〕王世貞，〈題弇園八記後〉，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248。
145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 1，〈東園〉，頁 34。

> 至萬餘金，署曰平蕪館，知縣吳盤齋為作記。遂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張謂人曰：「吾治此園，將與邦人共之，不若鄰家某之小量也。」識見亦超。[146]

故事的主角嘉定人張丈山，本是以貿遷爲業，雖然其資產不過是中等之家，然而他卻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他想借以宴客，但主人不許，張丈山一氣之下，遂花萬餘金買下城南隙地築爲園林，而且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錢泳就稱讚他是「識見亦超」。

私家園林平日開放到什麼程度呢？什麼人可以進入遊覽這些私人園林？當然園主會主動邀請好友參觀，或有官紳與著名文士要想進入這些私家園林，大概主人也都不會拒絕。不過，也會有優先順序，官員就比文士或幕友優先，例如錢泳曾二度造訪杭州清泰門北的皋園，該園俗名「金衙莊」；第一次在嘉慶元年(1796)，「園主人託故不納，悵然而返」；第二次是道光 13 年(1833)冬，偶至杭州時又同友人造訪該園，「甫入門，見叢桂編籬，枯槐抱竹，正顧盼間，園丁出報云，有官眷遊園，不便入也。」[147]看來錢泳與該園無緣，概因其幕友的身分地位，遠不如正式的官員。不過，除了對這類有身分的人開放以外，園林也有對一般城市住民開放的時間。

私家園林轉向公共空間

江南城內與城郊的園林，雖爲私人所擁有，但是在特定的時節，也會對市民開放，允許人們入園遊覽。園林在特定時節時的開放遊覽，在江南某些城市已經發展成爲特殊的景觀。像蘇州每當春天的遊園活動，已成爲當地的歲時活動，列入明清方志的〈歲時志〉中。在明代，蘇州城內與城郊的許多著名園林中，[148]已經有園林在特定的時候會開放給外來人遊覽。例如在城北有小隱堂之

---

146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9-540。

147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41。

148 袁宏道(1568-1610)〈園亭紀略〉一文提到蘇州著名的園林，包括有參議徐廷課的園林（在葑門內）、王元美的小祇園、正德朝內閣大學士王鏊的園林（在閶、胥兩門之間）、太僕寺少卿徐泰時(1540-1598)的園林（在閶門外下塘）以及著名的拙政園（在城內）。參見〔明〕袁宏道，

秀野亭，正德年間以來，「蘇人多遊飲於此」；[149]另一個較完整的記載，是曾任浙江按察使司參議徐廷課在葑門內所修建的園林，據《近事叢殘》記載云：

> 徐少浦名廷課，蘇之太倉人。後居郡城為浙江參議。家居為園於葑門內，廣一二百畝，奇石曲池，華堂高樓，極為崇麗。春時遊人如蟻，園工各取錢，方聽入。其鄰人或多為酒肆，以招遊人。入園者少不檢，或折花號叫，皆得罪。以故人不敢輕入。[150]

從引文中可以看到這個園林在春天會開放遊人進入，在門口有園工收門票錢，甚至在附近的鄰居都會開設酒店來招攬遊客，只不過入園的規定甚爲嚴格。此外，在城郊也有一些園林別業，可供人遊覽，如天平山上有萬曆年間參議范允臨（萬曆 23 年[1595]進士）所建之別業，招接四方賓客，「並爲遊者所走集，雖素玩麗矚不同，皆爲山林生色。」[151]

到了清代，蘇州園林更是市民遊玩休憩的重要勝地，尤其春天是開放遊園最盛的時節。袁學瀾〈吳下名園記〉提到蘇州城內著名園林，如滄浪亭、拙政園、獅子林與依園等，於春時遊客入園的情景：

> 方其盛也，春時開園設廚傳，園丁索看花錢，釵鈿雲集，車騎哄戶，袂雲汗雨，街衢塵漲，人聲嘈雜，擁擠不得行，人影衣香，與花爭媚，夕陽在山，猶聞笑語，人散後，遺鈿滿地，游者拾歸，致縈夢想。[152]

又據《清嘉錄》與《吳郡歲華紀麗》二書都有記載蘇州每當春暖之季，園林百花競放，閽人或園丁索掃花錢或看花錢少許，然後縱人流覽，而有「士女雜遝，羅綺如雲」之狀。[153]當地風俗是在清明日開放園林供遊人參觀，至立夏節時方

〈園亭紀略〉，收入《袁宏道集箋校》，上冊，卷 4，頁 180，頁 180-181。

149 正德《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據明正德元年刊本影印，1988），卷 31，〈第宅〉，頁 10b。

150 〔明〕沈瓚，《近事叢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乾隆甲寅刻本），卷 1，〈徐少浦園〉，頁 22b-23a。該園原爲吳寬之父，吳融所建之「東莊」，後爲徐廷課所有。

151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崇禎刊本影印，1990），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15-19，卷 3，〈山〉，頁 42。

152 〔清〕袁學瀾，〈吳下名園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286。

153 〔清〕顧祿，《清嘉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3，〈三月・游春玩景〉，頁 56；〔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 3，〈三月・清明開園〉，頁 104。

止。園林開放的時節，在附近也會形成商販聚集的市集，「隨處有趕賣香糖果餌，皆可人口。瑣屑玩具，誘悅兒曹。」[154]例如《吳郡歲華紀麗》描述蘇州三月，有「南北園看菜花」之俗，南園在子城西，俗名巴家園；北園在閶門內後板廠，舊名蘇家園，「春時菜花極盛，煖風爛熳，一望黃金。到處酒壚茶幔，款留遊客。」[155]

清代不少文人士大夫記載其親歷蘇州遊園的經驗與回憶。如程章華〈涉園記〉云：「花時則洞開其門，縱人遊觀，弗之禁」；袁學瀾〈游息園記〉回憶道：「每春時，士女看花，紈扇撲蝶，柑酒聽鶯，備極笙歌游衍之樂，由來舊矣。」[156]最生動的記載，莫過於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一書，記錄了乾隆 58 年(1793)時和其妻陳芸同遊蘇州的南、北園：

>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眾議未定。……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游人見之莫不羨為奇想。杯盤狼籍，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157]

從上述的引文可以知道蘇州南北園的開放情形，遊園者的身分為一般大眾，並不限於士大夫與縉紳階層。

現有的文字記載，描述蘇州園林遊人最多的當屬閶門外下塘花埠街的寒碧山莊，以及齊門內的獅子林與其附近諸園林。寒碧山莊從道光 3 年(1823)才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158]獅子林及其附近諸園遊觀的盛景，

---

154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 3，〈三月・清明開園〉，頁 104。

155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 3，〈三月・南北園看菜花〉，頁 124。

156 〔清〕程章華，〈涉園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88；〔清〕袁學瀾，〈游息園記〉，收入《蘇州園林歷代文鈔》，頁 87。

157 〔清〕沈復，《浮生六記》（台北：三民書局，2006），卷 2，〈閑情記趣〉，頁 31-32。

158 園主愛石，園中聚奇石為十二峰，乃以太湖石一時之選而構築成的。參見〔清〕袁景瀾，《吳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履園叢話》所記：「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159]即使是城郊的小市鎮，也有著名的園林供遊覽。如木瀆鎮有瑞園、潛園與遂初園等，該地接近靈岩山，春時遊人畢集。因爲園林是要收錢才能進入，所以要稍有貲財者才可進入遊玩，畢竟市井貧民是無力買門票，只能駐足其園前，就像《吳郡歲華紀麗》形容：「傭夫担豎，無資入游，群聚植立，以觀雜沓」；[160]不過，園林開放時並未限定入內遊覽者的身分。

綜觀之，蘇州歷經明清兩代，至少有近十餘個私家園林是在特定時節開放，提供客人遊覽。開放的時節通常是春天，從清明到立夏，近一個月的時間。開放的客人通常只要在門口付給園丁看花錢後，即可入園。從文獻描述「士女雜遝」、「誘悅兒曹」，可見入園者並無男女之別、長幼之分，甚至在階級上亦無限制，才會有沈復入園後，邀擔者同飲之畫面。還需要強調的是，園林開放的現象，不僅僅只有蘇州是特例，《履園叢話》中〈園林〉一項還提及江南其他兩處名園，也是對外開放：

>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村又葺而新之，遊人雜遝矣。[161]
>
> 吾園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別業。得露香園水蜜桃種，植數百樹，桃花開時，遊人如蟻。[162]

而入園前園丁索錢的情形，在其他江南城市也可以看到。例如清人龔煒在《巢林筆談續編》提到蘇州府崑山縣的北園，「在馬鞍之陰，因山爲屏，疏泉爲沼，有卉木亭臺之勝，無闤闠囂塵之擾」，然而，「自少至壯，每至山間，輒往遊

郡歲華紀麗》，卷 3，〈三月・清明開園〉，頁 106。〔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9。

159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3。

160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 3，〈三月・清明開園〉，頁 107。

161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21。

162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8。

焉，園丁猶必索錢然後入。」[163]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城市園林不僅是縉紳富人的私人空間，對城市住民具有另外一層意義。因為私家園林的開放，提供市民新的休閑場所，同時也蘊釀出新的觀念。這個新的觀念就是城市內需要可以供民眾休閑遊覽的公共空間，最明顯的反應就是許多園林與當地城隍廟結合，形成廟園合一的公共休閑空間。過去城市內的廟宇可以說是少數供民眾活動的公共空間，至清代中葉以後，不少江南城市中的廟宇，特別多是城隍廟，廟內也都建有園林，據錢泳的說法：

> 今常熟、吳江、崑山、嘉定、上海、無錫各縣城隍廟俱有園亭，亦頗不俗。每當春秋令節，鄉傭村婦，估客狂生，雜遝歡呼，說書彈唱，而亦可謂之名園乎？[164]

有的則是廟方併購園林，如蘇州府屬嘉定縣東城的秋霞圃，極木石亭館之盛，原是明朝廣西布政使龔錫爵（明萬曆 2 年[1574]進士）所築之園林，後歸汪氏，至清中葉則併入「邑廟」。同縣南翔鎮由明朝生員李宜之（按：李流芳之子）所建之漪園，鼎革時遭奴變，園林遂改為城隍廟。[165]蘇州府屬崑山縣城內有繭園，原為明代吏部侍郎葉盛(1420-1474)之園林，後來也是「鬻於邑廟」。[166]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豫園，豫園自從建城隍廟於其中後，成了某些同業公所，也成了市民遊覽的公共空間。《履園叢話》記：

> 豫園在上海城內，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築，方伯自有記。……今造城隍廟於其中，為市估所佔，作會集公所，遊人雜遝，婦女如雲，醫卜星相之流，亦無不畢集，雖東京大相國寺不能過之。[167]

到了晚清，據王韜(1828-1897)的描述，城隍廟內的園林，已成為上海市民最重要的休閑遊覽勝地：

---

163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 4，〈北園〉，頁 91。
164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45。
165 〔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 7，〈嘉定〉，頁 149-150。
166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下卷，〈繭園〉，頁 217。
167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園林〉，頁 537。

> 城中遊覽之地，以城隍廟之東、西兩園為最盛。西園遊人雜遝，東園則雙扉常鍵，值令節始啟之，幽草孤花，別開靜境，大境高閣可遠眺為城西勝處，桃花開時，士女叢集也。[168]

又如蘇州府內諸多園林經庚申之變後毀，迄晚清部份重修或改建，有不少成爲宗族的義莊、同鄉或同業的會館公所。如附表四中的「之園」，清末俗稱「全浙公所」；「環秀山莊」有汪氏家族的「耕蔭義莊」；原來的藝圃，至清末歸絲綢公所，改名「七襄公所」；原來的韓氏洽隱園舊址，晚清重建爲蕙蔭園，內有忠烈祠與安徽會所。至此，我們看到更多的私家園林，轉變成家族與社會團體的公共空間。

結　論

當我們走在蘇州城內的園林，徜徉在彎曲迂迴的小徑，歇憩在疊壘的假山一角，觀賞潺潺清流入深潭，感受閑適境界，驚歎美不勝收，從中可以體會到中國傳統建築與美學精粹而又具體的呈現。然而，一旦將江南園林放回明清的歷史脈絡中，重新探索園林的歷史後，我們發現的是，園林的出現、築園的觀念、園林的性質與功能的變遷等等面向，都是在複雜的社會情境下所形成的。

晚明以來大量出現的園林建築，其實是一種社會風尚下的產物，爲的是誇示身分、炫耀財富與成就。而且最先引領風尚者，就是縉紳士大夫，接著又可以看到富戶商人的群起效尤。園林成了奢侈浮華的象徵，在傳統強調崇儉黜奢的觀念下，不免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從明清的筆記小說中，就可以看到許多嘲諷園主的故事；甚至蓋園林成了反面教材，有不少著作是告誡士大夫，園林難以維繫，莫以築園爲要務。

不過，面對社會輿論的批評，明清仍有不少士大夫或文人以築園爲「癖」。園主或其友人在撰寫〈園林記〉時，一方面也批評社會競築園林之風，另一方

---

[168] 〔清〕王韜，《海陬冶遊錄》（台北：廣文書局據光緒 4 年刊本影印，1976），收入《豔史叢鈔》，卷上，頁 545-546。

面則力陳築園的動機是為隱居、孝親、著述、交友與政事等等，園林內部陳設亦不過是「質樸而已」、「清寂而已」，以此極力與聲色酒肉、侈靡相高的「他者」園林相區隔。這樣的論述，可以說是在社會壓力之下的一種反應。

此外，從〈園林記〉與其它筆記有關園林的文本，可以看到作者們透過這類文本的書寫，企圖建構他們理想的「文人化園林」。而「文人化園林」的書寫所強調的兩個面向，一是在園林所舉行的文藝活動，藉以建構文化名聲與社會關係；另一是園林所具備的幾種物質文化，包括裝飾、收藏與展示物，分別象徵著財富積累、文化品味與身分地位。前者是動態的活動，後者是靜態的物件，這兩種形式互相作用、交互影響，建構了「文人化園林」的形象。

明清江南許多園林都是蓋在城市內或城郊的關廂位置。從蘇州的例子，顯示出園林位置在空間上的分布，與城市各個區位的機能發展息息相關。從明至清，蘇州城市內住民人口與經濟發展，不斷由西部往東部擴散。反映在園林的分布，是明代集中在西北部，而清代往東南部的發展。蘇州城郊發展的情況，明代是以上、下塘街至楓橋一帶最為繁華，至清代，則是以虎邱山塘一帶為盛。

明清城市的私家園林，在性質上也逐漸發生變化。私家園林的主人考量社會輿論的壓力，並為獲得社會聲望，逐漸意識到園林開放的重要性。從蘇州的例子，可以看到晚明時已有私家園林於特定時節開放遊人進入觀賞；到清代，私家園林的開放成了蘇州一地的歲時風俗。至此，園林已不僅僅是士大夫著意隱居、獨善其身的空間而已，也不再是富戶商人純粹只為炫耀財富的裝飾品，它還是城市居民非常重要的休閑場所。私家園林的開放，不但逐漸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同時也形成市民對公共休閑空間需求的新觀念。至清代，江南有一些園林被城市內的廟宇併購（特別多是城隍廟），還有不少城隍廟也建有園林；又如蘇州的園林到晚清以後，有不少成了社會團體的義莊、會館、公所等等。這些現象，都說明了私家園林逐漸轉向公共化的傾向。

附表一：明代蘇州城內園林

1. 晚圃（在憩橋巷）	17. 拙政園（在婁門內北街迎春坊）	36. 顧家園（在玄妙觀橋南東巷）
2. 怡老園（在西城橋，清代改爲藩署）	18. 歸田園居（在婁門內北街迎春坊）	37. 管園（在北園崇甫巷，今稱油車巷）
3. 如意堂（在清嘉坊）	19. 顧貞孝宅（在西白塔子巷）	38. 五峰園（在閶門下塘福濟觀後，柳毅橋西）
4. 月駕園（在麒麟巷）	20. 何衙園（在水仙廟東）	39. 石虹園（在南倉橋北）
5. 息園（在開元寺後西蒲帆巷）	21. 張孝廉宅（在玄妙觀前小曹家巷）	40. 辟疆園（在甫橋南）
6. 徐園（在府學西平疇內）	22. 葑溪草堂（在葑門內姜家橋衖，後改名爲韓衙前，又稱天賜（四莊）	41. 雅園（在史家巷南）
7. 廢園（在桃花塢）	23. 桐園（在甫橋）	42. 槐樹園（在南倉橋西）
8. 陸氏桔林（在桃花塢）	24. 東莊（在葑門內）＊	43. 淡園（在白塔子巷）
9. 韓衙莊（在桃花塢）	25. 廷棵園〔在葑門內天賜（四）莊東〕	44. 唐家園（在桃花塢後，五畝園西，寶華庵址）
10. 多木園（在寶城橋北）	26. 歸氏園（洽隱山房）（在苑橋巷石子街北）	45. 鄭園（在吉由巷）
11. 申時行宅（在黃鸝坊橋東，今猶名申衙前）	27. 臥雪齋（在葑門上塘新造橋西）	46. 芳草園（齊門內定跨橋北石皮弄）
12. 蘇家園（北園；在閶門內後板廠）	28. 丁元復別業（在十郎巷）	47. 墨池園（梧亭；在清道橋南）＊
13. 醉潁堂（藥圃；在寶林寺前東）	29. 瓆園（在閶門水關北）	
14. 香草垞（在高師巷）	30. 無夢園（在孔副司巷）	
15. 二株園（在周五郎巷）	31. 竹梧園（在舊學前）	
16. 小桃源（在桃花塢）	32. 桂花廳（在周通橋南）	
	33. 春草閑房（在臥龍街西雙林巷）	
	34. 密庵舊築（在閶門內後板廠）	
	35. 圓嶠仙館（在懸橋巷）	說明：註記＊部份爲位置不明者

資料來源：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附表二：明代蘇州城郊園林

1. 荒荒齋（在館娃里） 2. 東園（即清代寒碧山莊；在閶門外下塘花步里，徐泰時建） 3. 西園（在閶門外治坊浜東，徐泰時之子徐溶建） 4. 月湖別業（在婁門外北塘周和山南） 5. 紫芝園（在閶門外上津橋）	6. 項家花園（在閶門外石磐巷，楓橋路東首） 7. 郭氏別業（在閶門外長蕩東山塘） 8. 文氏塔影園（在虎邱便山橋南） 9. 毛家園（礪庵；在閶門外下塘下津橋義慈巷） 10. 桃李園（在南濠談家巷興隆橋）	11. 近峰別業（在虎邱旁） 12. 蓼庵（在閶門外林家巷） 13. 寄傲園（在齊門外） 14. 葉唐夫宅園（在閶門外江村橋） 15. 真趣園（在酈季子巷，今名李繼宗巷，在山塘街） 16. 梅園（小吟香閣）（在齊門外安齊王廟西）

資料來源：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附表三：清代蘇州城內園林

1. 慕家花園（在黃鸝坊橋南。清初稱慕家花園後分爲二，西園爲董國華宅，東園爲畢園，清末稱遂園。）
2. 藝圃（在今文衙弄5號。即明代醉穎堂，清代歸官宦姜氏寓所，稱敬亭山房，後又辟爲藝圃，後歸絲綢公所）
3. 五柳園（在金獅巷）
4. 綉谷園（在閶門內後板廠）
5. 悔廬（在大石頭巷）
6. 香禪精舍（在閶門內劉家浜）
7. 秀野園（在閶邱坊依園東）
8. 雅園（在史家巷南，即明代雅園）
9. 依園（在閶邱坊巷南，瞿園，清末爲逸園）
10. 網師園（在帶城橋南，闊家頭巷東口）
11. 鳳池園（在鑾駕巷，俗稱鈕家巷）
12. 可園（樂園；在滄浪亭對面，原係滄浪亭的一部份）
13. 養心園（在鈕家巷）
14. 琢園別業（在懸橋巷）
15. 寶樹園（即明代洽隱山房，清遺民顧其蘊重修，俗稱顧家花園）
16. 尤侗宅（在葑門新造橋）
17. 蘧園、蔣楫宅、畢沅宅（耕蔭義莊、環秀山莊、頤園；在申衙前，即明申時行宅舊址，裔孫築蘧園，後歸蔣楫、畢沅，嘉慶歸孫土毅，道光歸汪爲仁，置耕蔭義莊，又重修爲環秀山莊，又名頤園）
18. 洽隱園（在北顯子巷，清韓馨所築）
19. 紅豆書莊（在城東南，冷香溪之北）
20. 止園（樸園）（在東白塔子巷，清末改建稱北半園）
21. 涉園（原獅子林部份）
22. 五松園（即獅子林部份，在婁門內直街）
23. 拙政園（斑竹廳、復園、書園、瑞棠書屋、樸園、忠王府；在臨頓橋東）
24. 辟疆小築（傳硯堂；在甫橋西街，長洲顧濟美宅第，稱傳硯堂，其增孫顧沅築園）
25. 王芑孫宅園（在新造橋巷）
26. 葑湄草堂（在葑門鸕鶿橋）
27. 雙塔影園（在官太尉橋西）
28. 種梅亭（在東白塔子巷）
29. 茧園（柴園）（在葑門蘇家巷東，今稱醋庫巷）
30. 志圃（在太平橋之南）
31. 荆園（在馬醫科巷東）
32. 潘姓宅（在衛道觀前7號）
33. 晦園（在東美巷17號）
34. 有懷堂（在婁門內直街，拙政園附近）
35. 蔣氏宅園（在南園）
36. 退園（在井儀坊巷）
37. 聽楓園（在小市橋東）
38. 紅豆樹館（在婁門內柳貞巷）
39. 流水禪居（在城東南木杏橋）
40. 勺湖（在閶門東）
41. 墨莊（在城南）
42. 留卧園（在婁門內）
43. 月滿樓（在城東北隅）
44. 祇園（在白蓮寺北里許）
45. 滄園（在西跨塘）
46. 鷗隱園（在城西）
47. 沈錫祚宅（在多冠坊北，久忘園故址）

（說明：此欄中園林尚無法確定正確位置）

資料來源：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附表四：晚清蘇州城內園林

1. 遂園（在黃鸝坊橋南，即慕家花園，清末稱此名。）
2. 七襄公所（原藝圃，後歸絲綢公所，改名七襄公所）
3. 曲園（在馬醫科，晚清建）
4. 之園（在長春巷，晚清建，俗稱全浙公所）
5. （南）半園（在倉米巷，晚清建）
6. 息園（逸園）（即依園，在閶邱坊巷南）
7. 綠水園（在碧鳳坊，清季布衣朱襄僑居）
8. 耕蔭義莊、環秀山莊、頤園（在申衙前，即明申時行宅舊址，道光歸汪爲仁，置耕蔭義莊，又重修爲環秀山莊、又名頤園）
9. 蕙蔭園（在北顯子巷，即韓氏洽隱園舊址，晚清重建，有忠烈祠與安徽會所）
10. （北）半園〔在東白塔子巷，即止園（樸園），晚清重建〕
11. 暢園（在廟堂巷22號，晚清潘氏建）
12. 慕園（在護龍街，又稱富仁坊巷，晚清太平天國慕王府）
13. 怡園（在臥龍巷尚書里，部份原爲明人吳寬之宅，晚清顧文彬建）
14. 任氏花園（在鐵瓶巷22號，晚清建）
15. 萬氏書房庭院（在王洗馬巷7號，晚清建）
16. 鶴園（在韓家巷，清末道員洪鷺汀始築）
17. 笑園（紫藤書屋；在昇平橋弄14號，清末建）
18. 馬大籙巷周姓宅院（晚清建，在馬大籙巷11號）
19. 馬大籙巷季姓宅園（在馬大籙巷37號）
20. 修仙巷張宅庭院（晚清建，在修仙巷13號）
21. 殘粒園（原稱東園，清末揚州鹽商所有，城西接駕橋附近裝駕橋巷34號）
22. 顧家花園（晚清河南某縣令建，在甲莊前4號）
23. 耦園（在婁門新橋巷東，即涉園，清末光緒年間重構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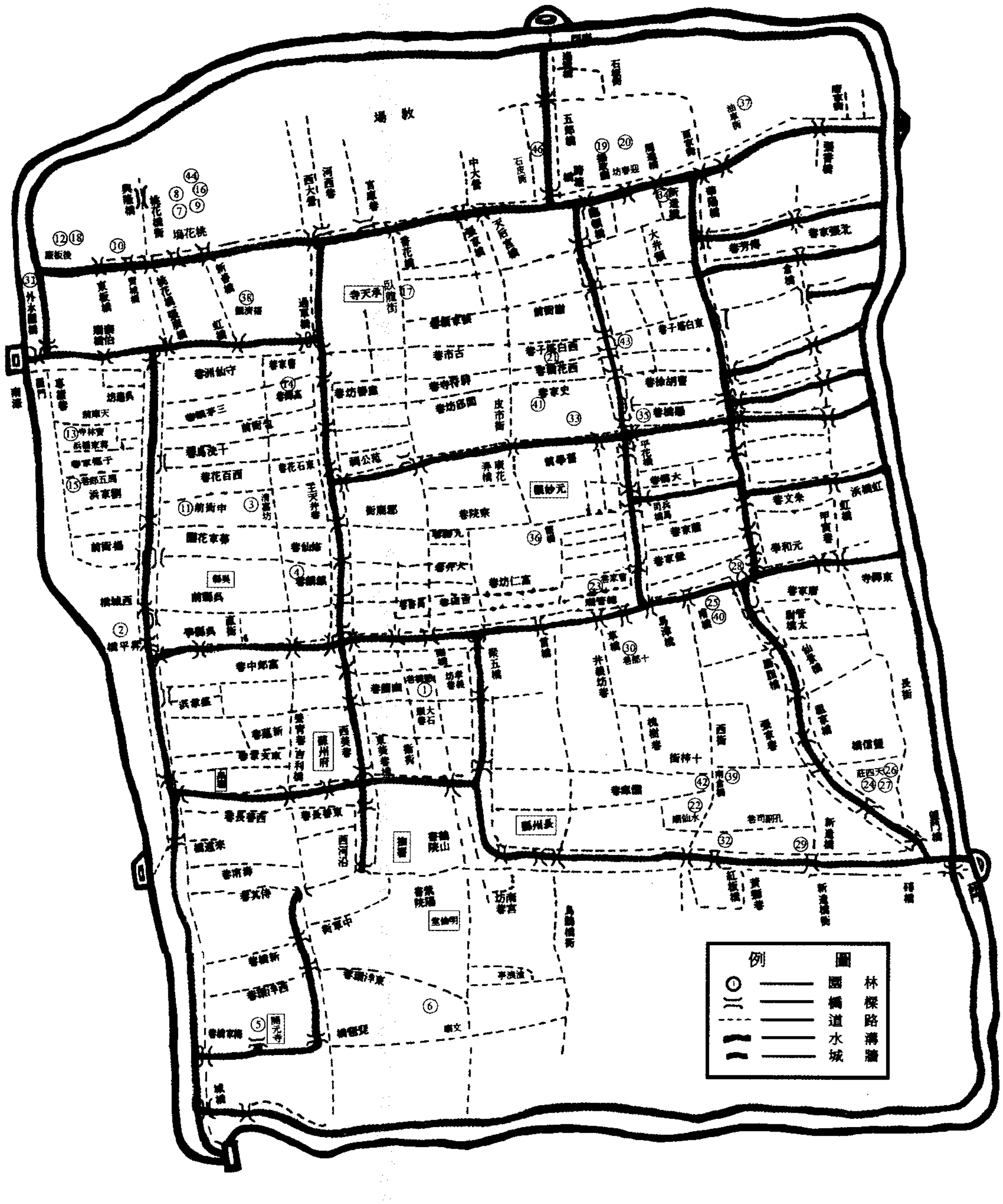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附表五：清代蘇州城郊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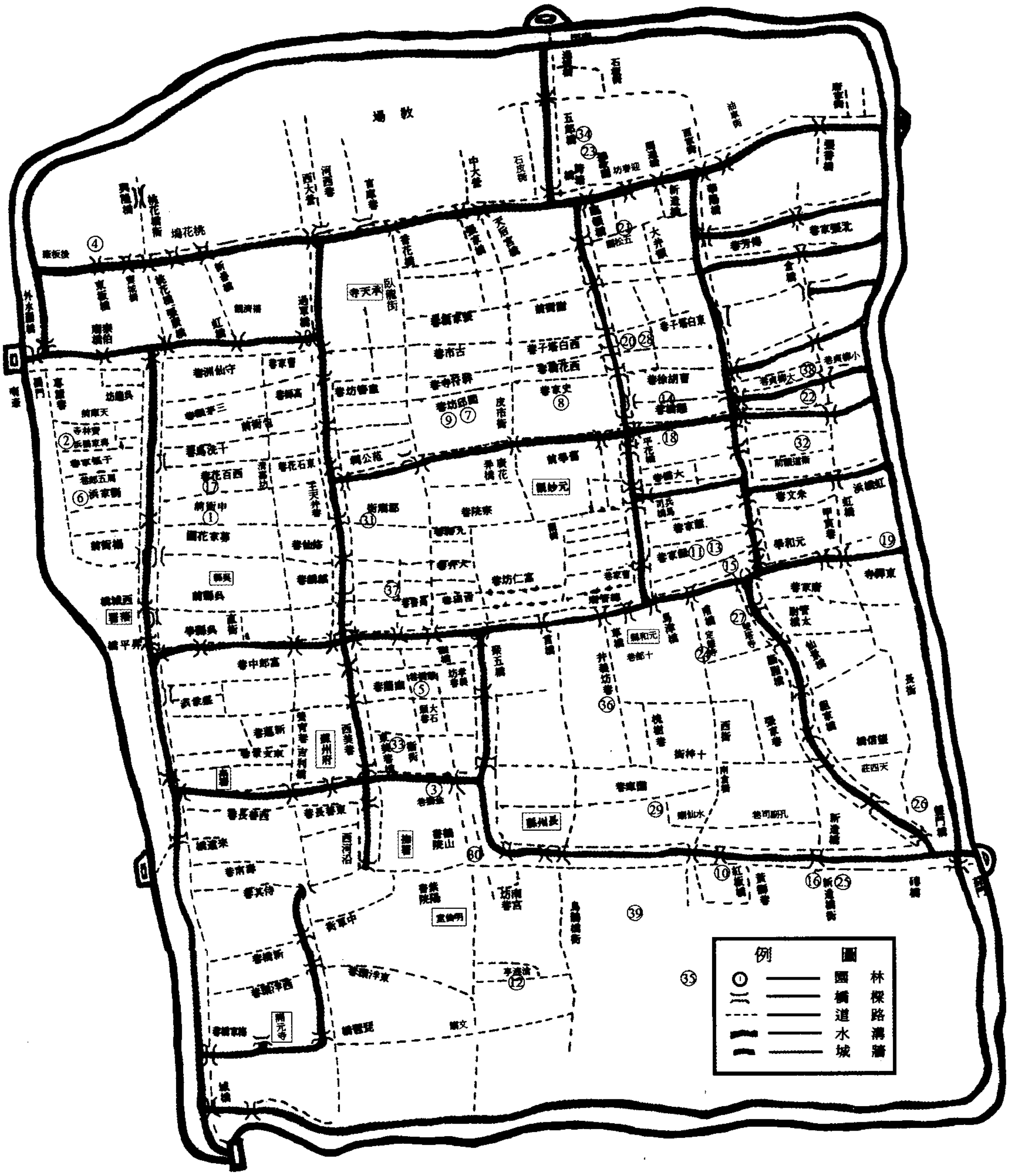
1. 清華園（在閶門外上津橋）	12. 藝芸書舍（在閶門外山塘）	23. 擁翠山莊（在虎邱二山門內）
2. 一枝園（在楓橋）	13. 挹秀樓（在虎邱山塘，清季太守吳雲別夜，後歸亢氏祠）	24. 三溪小隱（在虎邱申家莊）
3. 周錫瓚宅（在閶門外馬鋪橋）	14. 吟嘯樓（在虎邱青山橋西）	25. 萱園（在閶門外下津橋東）
4. 邱南小隱（在虎邱頭山門甬道之東）	15. 廣居（在閶門外，寒山寺東）	26. 堯峰山莊（在堯峰胡巷，今名蕭家巷）
5. 薛家園（在婁門外下塘）	16. 趙園（原爲明尚書吳一鵬真趣園，在閶門外山塘鄭季子巷）	27. 靈巖山館（在城外靈巖山）
6. 葑水園（在葑門外）	17. 三山館（在山塘，爲著名飯館，內有山景園）	28. 綉春園（在城外上津橋附近）
7. 漁隱小圃（在閶門外江村橋）	18. 繡雲別墅（在閶門外江村橋）	29. 七松草廬（在閶門外冶坊浜西園寺附近）
8. 西華別墅（在虎邱山下塘，甫里先生祠之側）	19. 養素園（在閶門外楓橋下塘）	
9. 蔣氏塔影園（靖園）（在虎邱東南隅雲岩寺左，清季爲靖園，俗稱李公祠）	20. 聚遠堂（在虎邱山塘）	
10. 一榭園（憶嘯園）（在虎邱斟酌橋，一云在東山浜北）	21. 涌泉庵（在虎邱後）	
11. 寒碧山莊（留園，即明代東園）（在閶門外花步里）	22. 程文煥宅（在楓橋鎮）	

資料來源：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附圖 1：蘇州城內明代園林分布



附圖 2：蘇州城內清代園林分布



附圖 3：乾隆《姑蘇城圖》中的田地分布

附圖 4：蘇州閶門外城郊圖

徵引書目

一、史料

〔明〕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

〔明〕正德《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元年刊本影印，1988。

〔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明嘉靖 44 年何氏香嚴精舍刊本影印，1971。

〔明〕何喬遠，《名山藏》。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崇禎 13 年刊本影印，1971。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明〕沈瓚，《近事叢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乾隆甲寅刻本。

〔明〕計成著，趙農注釋，《園冶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明〕唐錦，《龍江夢餘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 17 年郭經刻本影印，1997。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台北：廣文書局，1969。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崇禎刊本影印，1990。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59。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收入《叢書集成簡編》，冊 22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1965。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上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明〕楊循吉，《蘇談》，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上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明〕董邦政修，黃紹文纂，嘉靖《六合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

〔明〕鄭若曾，《江南經略》，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1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明〕薛岡，《天爵堂筆餘》，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 5 輯。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明〕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台北：廣文書局，1979。

〔明〕顧炎武，《肇域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藍欄抄本。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王韜，《海陬冶遊錄》，收入《艷史叢鈔》。台北：廣文書局據光緒 4 年刊本影印，1976。
〔清〕光緒《周莊鎮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 8 年元和陶氏儀一堂刻本影印，1997。
〔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 9 年刊本影印，1970。
〔清〕朱象賢，《聞見偶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冊 213。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清〕佘懷，《三吳游覽志》，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清〕宋犖編，《滄浪小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甲申 10 年(1884)江蘇書局刊本，共二卷。
〔清〕李漁，《十二樓》。台北：三民書局，1998。
〔清〕沈復，《浮生六記》。台北：三民書局，2006。
〔清〕邵長蘅，《青門簏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247-248 之《邵子湘全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1997。
〔清〕俞樾，《九九銷夏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重印本。
〔清〕姚廷遴，《歷年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清〕韋光黻，《聞見闡幽錄》，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清〕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40 冊 3。台北：新興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佛蘭草堂手鈔本影印，1985。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清〕康熙《吳縣志》，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康熙年間刊本。
〔清〕康熙《淮安府志》，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康熙 24 年刊本。
〔清〕張紫琳，《紅蘭逸乘》，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上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清〕曹家駒，《說夢》，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4 冊 8。台北：新興書局，1974。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許治修，沈德潛、顧詒祿纂，乾隆《元和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 26 年刻本影印，1991。

〔清〕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乾隆《震澤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 11 年修光緒 19 年重刊本影印，1970。
〔清〕陳祖范，《陳司業文集・詩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 29 年刊本。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陸文衡，《嗇菴隨筆》。台北：廣文書局，1969。
〔清〕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顧公燮等，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清〕顧祿，《桐橋倚棹錄》，收入王稼句點校、編纂，《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清〕顧祿，《清嘉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民國〕《烏青鎮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 23。上海：上海書店據民國 25 年刻藍印本影印，1992。

二、專書

王　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王宗拭，《拙政園》。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8。
衣學領主編，王稼句編注，《蘇州園林歷代文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邵忠、李瑾選編，《蘇州園林重修記・蘇州歷代名園記》。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4。
邵忠編，《蘇州園墅勝蹟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
柯繼承，《藝圃》。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
段本絡、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童　寯，《江南園林志》。北京：中國工業出版社，1963。
劉敦楨，《蘇州古典園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79。
魏嘉瓚，《蘇州古典園林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nnane, Antonia.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inaldi, Bianca Maria.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unchen: Meidenbauer, 2006.

三、論文

王家範，〈明清蘇州城市經濟功能研討——紀念蘇州建城兩千五百周年〉，《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頁74-84。

田中淡著，黃蘭翔譯，〈中國園林史研究的現況與問題點〉，《空間》，期65，1994年12月，頁57-64。

巫仁恕，〈明清江南市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九州學林》，卷5期4，2007年12月，頁71-119。

張朋川，〈明清書畫「中堂」樣式的緣起〉，《文物》，2006年第3期，頁87-95。

許亦農，〈作爲文化記憶的蘇州園林（11~19世紀）〉，收入米歇爾・柯南、陳望衡主編，《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323-354。

顧　誠，〈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蹟考〉，《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65-84。

Smith, Joanna F. Handlin.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February 1992, pp. 55-81.

Jiangnan Gardens and Urban Society: A Social-historical Analysis of Suzhou Garde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Jen-shu*

Abstract

The richness of garden cultur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should 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the gardens did not simply result from developments internal to literati culture.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building of gardens from soci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finding that the garden building brought into vogue by the gentry and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was not regarded with complete approbation at the time. An analysis of garden texts from Suzhou reveals how the gentry and literati, responding to critical views and social pressure, constructed an ideal garden culture through writing such texts.

Many of the famous gardens of the Jiangnan region were located in cities and their suburbs, and are best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 to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aily liv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thus explor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s of garde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lens of urban historical analysis. I conclude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ardens in Suzhou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s of specific locations in the city. Furthermore, the gradual opening of private gardens not only influenced citizens' lives, but also led to new demands for public spaces. This in turn led to a tendency for some private gardens to merg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ith temple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gradually created more open space for public leisure pursuits.

Keywords: gardens, Ming-Qing period, Jiangnan, Suzhou, cities